

恩 福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LESSINGS

V.19 N.3 總 68 2018/07



掙扎與重塑

一本當代中國教會敘事的新書

Review of *Surviving the State, Remaking the Church*
P10

謹防當下七種偏差思維

Beware of These 7 Flawed Mindsets

P2

從“性靈”到“靈性”

我的小說創作探索路徑

From “Self-Expressing” to “Spirituality-
Expounding”: My Pathway of Novel
Writing
P22



newenfu.org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
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詩篇100:1-3)

*Shout for joy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Worship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before him with joyful songs.
Know that the LORD is God.
It is he who made us, and we are his; we are his people,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psalms 100:1-3*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謹防當下七種偏差思維 2
Beware of These 7 Flawed Mindsets 陳宗清
人間“真道”在源頭 4
Back to the Origin to Find the Right Way 李靈
七十年 封底
The Seventieth Year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梅賽之爭——
從一場辯論看華宣教史的轉變 7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Machen and Buck:
Contemplating the Change of Mission in
China 馬麗
掙扎與重塑——
一本當代中國教會敘事的新書 10
A Review of *Surviving the State,
Remaking the Church* 王俊
辯證思維與屬靈生命的成長 13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Spiritual Growth 天靈
困境與美德——
讀《自信的多元主義》有感 15
Dilemma and Virtues: Thoughts after
Reading *Confident Pluralism* 李泉
一些神學問題的中國視野 18
Some Theological Issu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王志勇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從“性靈”到“靈性”——
我的小說創作探索路徑 22
From “Self-Expressing” to “Spirituality-Expounding”:
My Pathway of Novel Writing 施瑋
回國這六年 27
These Six Years Since My Return to China 李晶
2018北美神學生會議回顧 29
A Report on 2018 Chinese Seminarian
Conference in North America 李鋼
淡淡鄉愁 · 悠悠琴韻 31
Light Nostalgia and Lingering Music 舍禾

恩福

Blessings, Vol. 19, No. 3, Jul., 2018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8年07月 第十九卷第三期 總68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Dong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1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陳政、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謹防當下 七種偏差思維

陳宗清

在美國，我們不難發現：大多數傾向自由主義的媒體都對川普不懷好感。每一天，雅虎的首頁幾乎都在以負面角度報導川普的活動。同時，美國福音派內部的分歧也愈加嚴重。今年五月底，反普的教會領袖克萊蒙（Shane Claiborne）要到維州林區柏格（Lynchburg）主持奮興聚會，出發前一天，他卻接到恐嚇信，明言他若踏入此城，必將被捕，因為那裡絕大多數人是擁護川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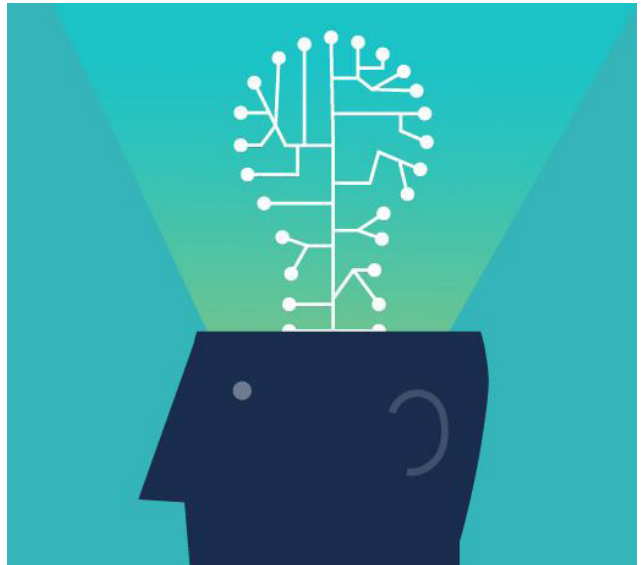
在教會界，我們亦常見一些人在發表議論時，喜歡用貼標籤的方式來批評其他教會。例如，自從今年5月12日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和警察發生衝突以來，網路上出現無數評論，其中不少採用標籤化的方式來加以指摘。

此篇文章嘗試探索七種在教會界常碰到的思維模式，分析其問題所在，期盼幫助讀者在思考有爭議的問題時，可以規避不當的思路，作較深度的反省與檢討。（以下各種「主義」，在哲學或社會學各有特殊意涵，筆者只以淺白的方式來使用。）

化約主義的問題

化約主義（reductionism）是說，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原本相當複雜，但我們在解釋時，往往只以一種簡單的因素來概括，而忽略其它的因素。例如我們會說：倘若一個男孩子未能與父親好好相處，那麼，以後他上班就很難服從老板的權柄。然而，男性雇員無法接受同性上屬的領導，原因很多；若遽下結論，常有失公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教會增長」的呼聲在美國教會中風起雲湧。華人教會界受到小組教會模式的刺激，紛紛尋求教會內部結構的改變。但不少教會因此受到危害，不僅人數未能增加，反而使一些信徒帶著淚水離開。其實，教會增長的因素很複雜，若是把它「化約」為一兩項，可能適得其反。



標籤主義的短視

標籤主義（labelism）在政界與媒體很常見。譬如，美國的媒體經常提到「種族主義者」（racist）一詞；而凡是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都被大加撻伐。因為這標籤意味著那人是種族狂妄者，隱藏著納粹主義的精神，是社會中極端危險的人物。

在所謂「福音派」教會中，對於「靈恩派」也容易以標籤式的精神去論斷。其實，「靈恩派」在華人教會中並沒有很嚴謹的定義，是相當含糊的標誌，缺乏眾教會共同接受的內涵和教義特點。所以，這樣的標籤常導致基督身體內的傷害與裂痕。

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被一些人貼標籤為提倡「神權政治」神學的教會。但若仔細研究，該教會王怡牧師的主張，離「神治制度」的藍圖還很遙遠。事實上，神權治理的模式只在舊約發生過；按照中國的政經情境中，根本無法發展出類似的模式。有關王牧師的行徑是否合宜？是否合乎聖經？這是有待商榷的。但是若講他要走「神權治理」的模式，未免不符實情。

直覺或主觀主義的危機

直覺或主觀主義（intuitionism /subjectivism）主張摒棄理性的分析，用直覺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這種觀點和後現代思潮所提倡的感覺趨勢相結合，會使人不看重理智的正常運用。魯益士（C. S. Lewis）認為，二十世紀之前，第一流思想家對價值的判斷必然奠基於理性，以不可磨滅的客觀性作為根據。可是，到了三十年代，納粹政權的崛起卻是依附一種哲學性的主觀主義，希特勒等人不斷用臆測和「優生學」的假說來擴大權力，滿足他們征

我們在下判斷、作結論時，必須徹底了解事情的本末，詳細研究，防止上述七種可能發生的思想偏差。
Before making comment or conclusion, we should thoroughly collect the facts and study them in detail, avoiding these seven flawed mindsets.

服世界的野心。

在教會也不難觀察到，有人會說：他擁有聖靈特別的感動，建議教會要怎麼做，不然就不合神的心意。其實，這乃是一種直覺主義的思維。這樣的信徒通常不會依循教會的決策管道與制度，只訴諸他個人的「感動」，以為他的感動凌駕於教牧和長執之上。這類憑靠所謂「靈覺」的弟兄姊妹，忽略了保羅所教訓的：「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

獨斷主義的盲點

宗派主義的精神過度膨脹時，就會落入獨斷主義（dogmatism）的陷阱。獨斷主義者容易高舉自己所贊成的信仰體系，而毫不考慮異議者所提供的反對證據。在一些自認是基督教正統的宗派中，都可找到獨斷主義的痕跡。

陶恕（A. W. Tozer）曾指出：「無論一個信徒的心多麼純潔、生命多麼順服，他所領受到的亮光，一旦經過他的頭腦，就不會再和寶座所發出的光完全一樣。正如一團泥，經過人的手一握，雖然仍是泥，上面卻有手的痕跡，同樣，神的真理經過人心的領會，雖然仍舊是真理，可是上面卻留下領悟者心思的印痕。真理無法進入一個不會運作的心思；心思要有反應，才能承受真理；然而經過接受的動作，心思便多多少少會把真理作了改變。」

范浩沙（Kevin Vanhoozer）在《聖經的神學解釋辭典》中，也對此問題作了簡潔有力的說明：「對於聖經是神的話，沒有任何一個宗派、釋經的系統、或解經的方法可以宣稱自己獨佔一切。如果基督徒想要呈現耶穌的心思，我們需要來自整個基督身體的見解，而這身體是由基督的靈所活化和引導的。」

天真實在主義的限制

有些人相信，透過感官、理性的知覺，可以確實掌握客體的知識，這便是天真實在主義（naive realism）。其實，人在搜集和整理客觀知識的過程中，一定會受主觀的影響，他所確認的知識也不可能是全面的事實。

今年4月17日，前中情局局長科米（James Comey）出了新書《更高的效忠》（A Higher Loyalty），來澄清自己的無辜，並指控美國總統說謊。然而，究竟是誰在說謊？媒體對此書的評價是分歧的。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家以為，科米並沒有活出自己所樹立的道德標準。而他是否能掌握「一切真實的證據」？按現代哲學認識論的原理來看，也頗有問題。

其實，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陷入「天真實在論」的窠臼。所以，我們應當不斷聽取反面的意見，思考其中是否有我們所忽略的真相。

多元主義的謬誤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多元主義（pluralism）盛行。由於交通進步，不同民族之間接觸愈來愈頻繁，世人頓然體會，世界是多元而富變化的：種族多元、語言文字多元、服飾禮儀多元。

既然文化是多元的，那麼，宗教是否也應是多元的？在這個時代，跨文化宣教士遇到一個嚴肅的問題：改變其他民族的信仰是否合乎道德？結果，宗教多元主義成為傳福音最大的障礙。

「多元主義」乃是強調，「多元」是普世公認的事實。因此，價值也應當是多元的；無人能指認某個體系絕對正確、卓越超群。然而，宗教多元主義是有問題的，它最大的謬誤在於：當個別宗教對終極實體的真理宣稱（truth claims）論點完全不同時，它就無所適從了。

時代錯置論的偏差

時代錯置論（anachronism）即是把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拿來與今天作比較。這樣的講法無異於假設：當下的處境與過去是一樣的。其實，每一段歷史都是獨特的，處境也是如此。譬如，有些在台灣的人會講，今天的台灣是「綠色恐怖」，以此與當年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然而，台灣目前的情境與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在中國大陸，有些基督徒提說：我們需要第二次「宗教改革」；或者說：我們要把教會帶領到像當年加爾文在日內瓦所建立的教會一樣。這樣的觀點乃是犯了「時代錯置論」的錯誤。

結語

在後現代思潮瀰漫的時代，對於任何議題，眾說紛紜的現象無可避免。然而，聖經是基督徒信仰絕對的權威，它出自神的啓示，是判斷一切思想的準則。我們千萬不要把人的話語「絕對化」。因此，「反普」或「挺普」是無意義的；甚至，「反以色列」或「挺以色列」也沒有聖經的根據。

在光怪陸離、詭譎多變的世局中，我們只能挺真理，為真理作見證。我們不要把相對的絕對化，更不可以把絕對的相對化。我們在下判斷、作結論時，必須徹底了解事情的本末，詳細研究，防止上述七種可能發生的思想偏差。

作者為恩福會長，本刊主編

人間“真道”在源頭

李靈



大溪流市（Grand Rapids, Michigan）2018年4月中旬，寒氣未退、春意未至，數日之內能讓人經歷四季的溫差。從春意盎然的洛杉磯突然置身如此氣候，真有點換了“國度”的感覺。整潔的街區鑲嵌著如此眾多的教堂，使這個小城顯得格外寧靜和安詳。看著那些哥德式的建築，讓人彷彿穿越了時空，返回到數百年前的歐洲。

筆者此次大溪流市之行，是應阿克頓宗教與自由研究所（Ac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berty）邀請，參加他們所舉辦的會議，主題為“如何建立繁榮經濟的道德根基”。第一晚，該研究所的創辦人演講，題為“基督教人類學”。這個演講把我的思緒帶到了人類的“源頭”。

眾學科的源頭

因為過去曾經在社會學研究所工作，所以我對“人類學”這一詞並不陌生。它起源於希臘文的ανθρωπος（人）及λογος（道，或學科）兩字，英文為Anthropology。最早見於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作品，是對具有高尚道德品質及行為之人的描述。

作為學科名稱，首次出現於德國哲學家亨德（Magnus Hundt）1501年的作品《人類學——關於人的優點、本質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19世紀以前，人類學所談的範疇相當於今天的體質人類學，指對人體解剖和生理的研究。

19世紀後，人類學越來越受廣泛的關注，甚至被視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源頭。

馬克思晚年（1879-1882年）曾對摩爾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爾等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的著作，寫下詳細的讀書筆記，學術界通常稱之為“人類學筆記”。對於摩爾根深入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經過二十年調查所寫出的《古代社會》一書，馬克思特別大加讚賞。他越來越意識到，對人類歷史、文明的未來展望，取決於對其源頭的尋根和理解。

馬克思沒有完稿的《資本論》第二卷，繼續在探究人類學，這可說是他伏案謝世之前一直關注的課題。

雖然馬克思晚年的研究從經濟學轉向了人類學，但是他始終視人為自然界的物質存在，主張人之所以能從動物蛻變而出，乃是因為“勞動”。19世紀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並沒有改變他的觀點；反而，更多的田園“事實”使他堅信唯物史觀，認為人類歷史是由低級向高級社會不斷發展。

與進化論的關係

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陵前致悼詞時說：“一如達爾文發現了生物自然界的演化規律，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其實，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直到最後的結論才出現“進化”二字，而且僅此一次。貫穿在他書中的焦點乃是：物種的演化並沒有規律，更談不上有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規律。這才是達爾文所要表達的思想。

不過，有關“進化”的思想，早在他的父輩，甚至更早，就已經有人提出了。而19世紀是人類瘋狂追尋“規律”的世紀，人們根本不理會任何“無規律”的發現。“進化”二字迅速被用來解釋社會上的弱肉強食的現象，“社會達爾文主義”應運而生，霎時風靡全球。

可以說，20世紀發生的所有“革命”、“戰爭”等，無不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或受其影響。

社會進化論瀰漫中國

中國“五四”運動期間，最初提出兩個問題：“我們怎麼了？”和“我們怎麼辦？”。這裡的“我們”，開始並不是指“國家”；無論是陳獨

基督教人類學試圖回到人類的“源頭”，來真正瞭解人的“本相”，“墮落”的原因，以此瞭解希望何在。
Christian Anthropology goes back to the origin of man to grip our true nature and the reason of our fall, and see where our hope lies.

秀還是胡適，都不是為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在奮鬥，而是要再造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是個體的人，有獨立自由品格的“我”。

遺憾的是，這場追求新人格的文化運動，最後卻變質了。在席捲全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下，它變成愛國的民粹運動。一時間，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表達進化思想的詞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近代知識分子信奉的信條。魯迅、毛澤東都是“嚴復迷”。毛澤東更由進化論的理念出發，得出“落後就要挨打”的說法。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國古代的“霸道”思想極為吻合，很快成為改造“啓蒙”思想的催化劑。“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儘管和“平等”、“自由”的“啓蒙精神”背道而馳，卻被視為世事實際運行的規則。

帶有鐵血精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以進行曲的節奏，將種族、國家高高捧起，將個人、平等重重踩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近代中國國家一直面臨危亡，所以“救亡壓倒一切”。

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影響當時的知識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還成了21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主要精神源泉。

七十年代末，面對全國經濟瀕臨崩潰，當時的總理華國峰提出“再不發展經濟，中國就要被開除球籍了”，這同“落後就要挨打”是同一個思路。所以，發展就成了“硬道理”，一切為了GDP。這個口號貫穿整整四十年，直到今天。

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不擔心會“被開除球籍”，卻擔心替代不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我們以為國家“富”，就一定也“強”；以為經濟上去了，國家就崛起了。

源頭問題無法迴避

2008年，哲學家李澤厚出版了《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一書。他從研究康德哲學的批判性，轉向深究人類學的本體論；這應該是他哲學境界的一次昇華。他以‘人活著’這一原始現象作出發點，延伸出對人類命運三方面的關注：（1）歷史終結，人類向何處去？人會如何活下去？（2）人生意義何在？人為什麼活下去？（3）歸宿何處？家在何方？人活得怎麼樣？

可是，他卻迴避了人類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根本問題。然而，倘若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又怎能回答“人類向何處去”的歸宿問題？迴避人類“源頭”問題的“人類學”，必然導向社會達爾

文主義。

今天的中國依靠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謀求國家的強勢崛起，而國人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表現出“自卑”和“自傲”心態的兩極，其中所暗示的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焦慮。

基督教人類學的觀點

讓我們回到“基督教人類學”來看。這是從聖經的角度來研究人類的新興學科，20世紀初湧現了不少優秀的學者，其中，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貢獻最引人注目。

關於現代性，韋伯的觀點可說是世俗化的理論，而杜蒙的觀點則可說是基督教化的理論（Christianization theory）。他認為，以個人主義為特色的現代國家，從結構而言，其基礎是具教會本質的；他甚至認為，現代國家就是“轉化了的教會”，且這是可以準確而深刻證實的。

當然，看出現代國家（社會）與基督教有內在關係，或將基督教視為現代國家的內在精神，並非僅僅杜蒙一人而已。1986年，帕裡（Jonathan Parry）曾嘗試界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基督教神學理論之間的關係。從加爾文神學思想的表達來看，上帝是凌駕於一切意志之上，而每一個追隨基督的人都不斷努力“效法”基督，所以在基督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個體”。現代國家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個體”之上。

人類源頭與道德基礎

阿克頓研究所2018年邀請國內二十幾位學者參加活動，讓該研究所的幾位講員，圍繞著如何建立現代經濟交往的道德問題，作一系列的演講。

該研究所的創始人司立科神父（Fr. Robert A. Sirico），以“基督教人類學”為題開始第一講，目的就是希望從人類的“源頭”去尋求現代社會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基礎。

與其他人類學相比，基督教人類學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特點，便是回答了“人”的“源頭”問題。基督教人類學試圖回到人類的“源頭”，來真正瞭解人的“本相”，“墮落”的原因，以此瞭解希望何在。

只有當我們決心恢復與神的關係，並通過這個關係，彰顯人所應有的“神的形象”，才能重建心靈、道德，以至成為社會各種交往活動中行為的道德根基。換言之，只有知道了“人從哪裡來”，才能回答“人到哪裡去”的問題。

今天中國人正開始尋得真正的“源頭”。知道了我們是從哪裡來，也就清楚將要向何處去了。
Nowadays many Chinese started to seek our true origin. Only after knowing where we were from could we know where to go.

人的非物質部分

《聖經》有兩段經文具體描述上帝造人：

(1)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創世記1:27）(2)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世記2:7）

第一段經文中，“照著自己的形象”是指神造人過程中的“非物質部分”，這使人有別於物質世界，也有別於動物世界。第二段經文描述神造人所使用的物質部分。人的本性究竟是由物質部分來代表，還是由非物質部分？這不僅成了東西文化差異的關鍵點，也成了西方啓蒙運動前後思想史的分界點。

啓蒙運動高舉“理性”大旗，通過肯定人的“理性”，來消解人所應有的“神的形象”。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就是把人的自我意識、人的理性看作人的存在本質。

康德1784年寫《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啓蒙？》他所下的定義為：“啓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中走出來”。康德認為，人人都有同等程度的理性認識能力，只是一般人都依賴權威人士來設計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不去獨立思考。人類之所以未能運用理性，乃是個人求知意志力不足。啓蒙運動是一場解放運動。在康德看來，這運動的精神就是“要敢於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同樣是倡導“理性”，但後者是以“信仰”為前提；而前者則是在“信仰”之外。啓蒙運動時期談理性，都伴隨著對宗教（基督教）的批判。

啓蒙運動以後，對於“人”的定位是以“人本”、“人道”為名義，從“非物質的本性”向“物質的本性”傾斜。而原本使人有別於萬物、並且使他與造物主交心的非物質部分（“神的形象”），便不再成為人的主要部分，也不再成為人的心靈、德性以及社會交往行為的根基。

明白源頭才有根基與方向

世俗的人類學力圖從人類最“原始”的狀態著手，研究人類社會的變遷規律，為了彌補以往歷史學、社會學缺乏“史前史”的不足。重要的是，他們根據基督教出現之前的歷史狀態，來否定基督教的必要。為此，啓蒙時期的一些思想家還把中國作為依據，認為中國沒有基督教信仰，也照樣走過了幾千年的文明。

正因啓蒙運動開創了“理性至上”的邏輯，

西方思想史上相繼出現了唯物主義和進化論思潮，並且兩者互為論證。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學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顯學”。人類學家熱衷於把“人類”的自然（物質）狀態作為人類歷史的“起點”、把人類肉體生存的需要看做一切行為的根據，從而得出結論：一切為了人類自身生存的需要而發生的行為、事件，都是“合理的”。

“利益”主導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因為“利益”而越來越不受約束，越來越失去控制。經過19世紀思想反叛的醞釀期，“革命”和“暴力”充斥了20世紀。

中國歷史上沒有形成一神宗教，更沒有經過基督教的洗禮，似乎形成了有別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獨特“東方文明”。但這並不等於中國就置身於世界歷史之外。其實，中國人的“源頭”問題至今都是個迷。中國人自以為是“炎黃子孫”，但“三星堆文化”遺址的發現，令我們陷入極度的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而中國人的先祖很早在追尋“死後”的事，希望知道自己“往何處去？”但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把這個問題擱置了兩千多年。

直到19世紀，中國才真正受到西方的衝擊。面對宣教士傳播的基督教，士大夫協同皇權竭力抵制，並不斷煽動民衆反教；面對洋槍洋炮，士大夫鼓吹“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政府也推動“洋務運動”。

“五四運動”可算是中國的社會精英真正開始效法西方，來設計社會的未來，也是中國力圖融入世界潮流的開始。遺憾的是，“五四”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走上了反教、唯物的道路。

可喜的是，歷經一個世紀的“滄桑”，嘗到“無神”的苦果後，一些中國人終於“認祖歸宗”，找到了自己“源頭”——我們原本也是神所造的，與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都是出於同一個“源頭”。朱熹曾寫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今天中國人正開始尋得真正的“源頭”。知道了我們是從哪裡來，也就清楚將要向何處去了。

阿克頓研究所司立科神父講“基督教人類學”，是要提醒中國知識分子：只有接受神造人的事實，才會明白每個人都應該有“神的形象”，這就是一切社會道德的倫理根基。

所以，人間真道在“源頭”。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梅賽之爭

從一場辯論看在華宣教史的轉變

馬麗

教會歷史學家馬斯登（George Marsden）常說，寫歷史的最佳方法，是從一次爭議（controversy）切入。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宣教事工在華發展的高峰期，人們記得宣教士曾在中國建立學校、醫院和媒體，但很少有人留意到這段時期的一些爭議。其實在1920年代，美國基督教界曾經歷一場大分裂，教會史上稱之為“基要派—現代派之爭”（the Fundamentalist-Modernist Controversy），而其中一幕直接與宣教士在華的事工策略有關，並涉及兩位後來名聲顯赫的人物：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和梅欽（Gresham Machen, 1881-1937）。

梅賽之爭

按賽珍珠的說法，她與梅欽兩人一生從未謀面。他們的交集，是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會（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PBFM）。



隨著“基要派—現代派之爭”在整個美國教會界的公開化，1932年一位PBFM委員發表了一份題為《反思宣教事工》的報告，呼籲用新眼光看待其他宗教，因為其中也有真理，而宣教應該培養一種共同尋求真理的態度。作為理事會成員和常年在中國的宣教士，賽珍珠百分之百贊同這份報告，她認為每個美國基督徒都應該讀一讀。她還指出，西方宣教士應拋棄過去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因為那“讓福音成為一種迷信”。

此後不久，作為PBFM主席的梅欽公開發表一份110頁的文件，回應並批判了此報告的自由派立場。梅欽也激烈反對賽珍珠的理念，說她的觀點是一種“激進、反基督教”的立場，甚至要求她從

PBFM理事會辭職。

此後，賽珍珠自動辭職，在辭職信中她說：“我從來沒有做過那樣的福音宣教工作。我是一位教師……我想要回中國，繼續我在那裡的生活，只是沒有宣教士的正式頭銜了。”

由於這次爭論，梅欽在1933年建立長老會海外宣教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Board for 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s），約束加入的宣教士必須持守傳統教義。

梅欽的生平和中國事工並沒有直接關係，但他的名聲遠揚，不僅被認為是最後一位普林斯頓神學家，也是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創始人。他年輕時曾在德國求學，接觸過現代派神學，讓他的信仰曾有過迷惑階段，但最終他更加持守傳統信仰。梅欽一生被譽為“戰鬥的”神學家，因為他熱衷於嚴謹護教，不在教義上妥協。

賽珍珠後來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文學家，但在1933年時，她至多是一個倔強地堅持自己看法的宣教士。實際上，對於梅欽的語言和眼光，賽珍珠並不陌生，因為她的父親嚴守加爾文主義傳統，和梅欽的氣質很像。賽珍珠此次的公開爭辯，或許也是她從小反抗父親的延續。

1937年新年時，梅欽去世，賽珍珠發表了一篇緬懷他的文章。在欽佩的讚揚之詞背後，她還是用犀利的文筆寫出她對當年那場筆戰的記憶：

他是一位可敬的人，從不向任何人低頭，也不向誰妥協退讓。……他若是生在中世紀，或許會一邊安詳地侍奉上帝，一邊又將別人送上火刑架。……在當下這個被懷疑之風弄得黯淡無光的時代裡，他的生命曾如烈火一樣炙熱，無所畏懼，不計後果挫敗。……他整個人所持守的，是在他看來超越時代、值得為之而戰的信念。這些信念給了他動力，去反對所有與之相悖的事物。……與他相比，那些教會裡爭名奪利的、見風使舵的、玩弄權術的，都只不過是在一種自以為義的虛假中，丟失了正直。……我多麼希望梅欽博士還活著，我希望再與這樣的人戰鬥。

賽珍珠在中國長大，與中國保姆感情很深，也融入當地人的悲歡離合中。
 Pearl Buck grew up in China. She was very close to her nanny and deeply touched by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神學的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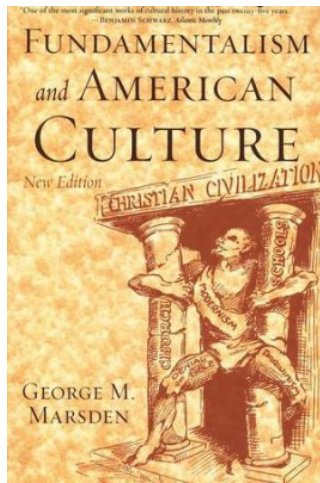
今天看來，也許荷蘭改革宗宣教學家J. H. 巴文克可以更好地回應此次爭議。畢竟歸根究柢，問題還是普遍啓示與特殊啓示的關係。

當歐洲的宣教士（包括天主教和新教）進入異族文化時，他們所持的神學還來不及應對處境的挑戰。更確切地說，西方教會原本以理性化表述為主的神學，在宣教工場上經歷到被試煉、破碎、重塑的過程。可惜在新教教會中，此類辯論大多都以分裂的遺憾為結束。

二十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美國自由派和基

要派之爭非常激烈，在強烈辯論的風氣中，雙方都變得愈發激進。馬斯登在《基

要主義和美國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一書中，分析了這種越來越漲的兩極化過程。最後，自由派佔據了美國文化的高地，而基要派則築起分離主義的高牆，不再關注時事，逐漸與時代脫節。



漸與時代脫節。

宣教工場的代際差異

與十九世紀宣教士入華的時期相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是“梅賽之爭”發生的時期，在中國的宣教士群體，結構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宣教士可說已經歷了四代接力，從馬禮遜、戴德生、馬提爾、到李提摩太。李提摩太與賽珍珠一樣，注重倡導社會改良過於傳講傳統教義。

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曾藉任職東印度公司翻譯員的機會，進入中國十年，可惜並沒有帶領一個華人歸主。他後來在馬六甲建立一所學校，希望用教育事工來為基督教入華破冰，同時對海外華人宣教。

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1855年進入中國，頭七年只得著一個中國信徒。

1863年，馬提爾（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7）在山東巡迴佈道，九年後收效甚微。他正想放棄這種傳福音方法時，卻發現自己的妻子在家裡建立起一所小學，而很多華人願意把家中的男孩子送來學習。

1877年，新教的宣教士第一次在上海召開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在傳統宣教方法（街頭佈道、發傳單）遭遇挫折時，該如何調整策略。馬提爾試圖說服其他宣教士，可以藉教育事工來輔助宣教，但大多數人對這一轉向還是存著疑慮。

賽珍珠的父親就是在這個時期（1880年代）被美南長老會差派，在中國沿海地區（江蘇）巡迴講道。當時賽珍珠剛出生三個多月。她在中國長大，第一語言是中文，後來母親才教她英語。

18歲時，賽珍珠回到美國，就讀於一間女子學院。她1914年畢業，以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會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國，與丈夫一同在南京大學等高等學府任教。

美國社會的變化

在賽珍珠幼年的記憶中，父親那一代人的宣教策略是笨拙、可悲、無效的。有一次，她父親用不流利的中文，面對一群中國人，嚴肅莊重地傳講罪、地獄和永遠刑罰。聽眾中有些人搖頭想要離開，但一個中國女人拉住朋友的衣袖說，“聽聽這個可憐的洋人吧，他從那麼遠的地方來。讓我們幫幫他救他自己的靈魂吧。”

在幼年的賽珍珠看來，父親是一個滑稽悲慘的角色，因為他所講的，永遠不可能讓這群梳辮子、綁小腳的異教徒聽懂。

第二次宣教士大會於1890年召開時，越來越多人認同教育事工的合理性。此後義和團運動爆發，讓更多宣教士希望轉向溫和的宣教策略。中國人素來尊師重道，辦教育可以贏得當地人的尊敬，甚至結交社會的菁英，顯然是極佳的策略。

那一代來華的美國宣教士，自己所成長的美國家園也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工業化、移民、城市問題，都挑戰著倫理、社會和宗教規範。年輕的宣教士大多仍持守父輩的傳統新教價值觀，但同時也擁抱具時代特徵的進步觀和啓蒙思想。

美國社會出現越來越多新興的職業，教會領袖的子女發現，除了牧職之外，他們還可以選擇進入文學、新聞、政治、外交、社會等行業。反觀之，基督徒進入各行各業，也給美國公共意識帶來生機蓬勃的宣教式熱情。當時的公共話語中，充滿了聖經比喻和千禧年主義的象徵用詞。

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強化了這些激情和盼望，帶出更激進、更理想化的神學現代主義。那段時期，新教運用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術領導力，使美國的高等教育界充滿著理想，要引導世界

“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標籤，或許都不足以表達個別宣教士在真實處境中的掙扎過程。
The label of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was hardly enough to describe individual missionary facing daily struggle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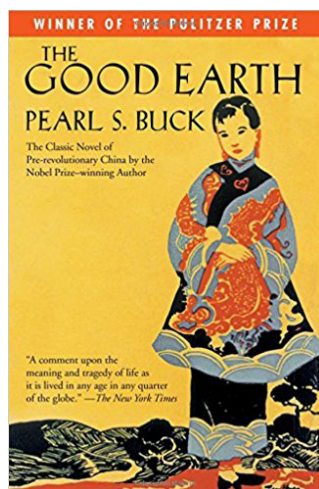
各國“學會自由和正義”。

與當地文化的認同

賽珍珠在中國長大，與中國保姆感情很深，也融入當地人的悲歡離合中。

她成年以後，並不覺得這些異教徒有什麼可悲之處；恰恰相反，她看到他們當中真實可敬的人性，對他們的苦難（也許在傳統宣教士看來是因不信上帝而造成的悲慘）生出很深的同情。

賽珍珠在文學上非常成功，例如《大地》（*The Good Earth*）在1932年在美国贏得普利茲小說獎，1938年又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她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寫出了在中國所體驗到的民生人性，和這片廣袤黃土地上的血肉故事。



賽珍珠與中國文化的近距離接觸，成為“過度處境化”（over-contextualization）的例子。她被中國人生命層面的複雜性、戲劇性所吸引，而她父母自幼所教導的加爾文主義，對她卻顯得十分遙遠。

宣教運動的全球化背景

宣教士進入異族文化時，自己的世界觀和信念有可能會發生變化。華裔教會史學者連溪，在《宣教士的歸信》一書中對此曾作出分析。“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標籤，或許都不足以表達個別宣教士在真實處境中的掙扎過程。

1900年之後的中國，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社會：外族入侵、官員腐敗、匪盜猖獗、政治動盪、物質貧乏、饑荒災害，讓這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陷入徹頭徹尾的危機之中。宣教士進入中國，很快便陷入兩難：如果只是專注於宣講福音，就無法顧及民眾物質層面的需要；但如果從事醫療救災賑濟等社會工作，又會消耗太多精力和資源，還會背上“自由派”的罵名。

從較大的視角看，當時的普世宣教運動正與全球化過程並行。後工業時期的貿易全球化，造成南北經濟的不平等加劇。1900年之前，中國閉關自守，信息交流技術又不發達，宣教士入華之前並不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更談不上對時事危機有什麼

認識。他們好似一個移民群體，要跨越巨大的生存差異鴻溝。可以說，他們好像進入了一個平行宇宙，必須掙扎著適應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就連原來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會被消磨和改變。

中國社會的變革

第一代、第二代持守基要信仰的宣教士，在中國所看到的，多半是異教風俗帶來的可悲光景。他們用書信、事工報告的形式，將這些畫面和分析傳遞回國，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國民眾的中國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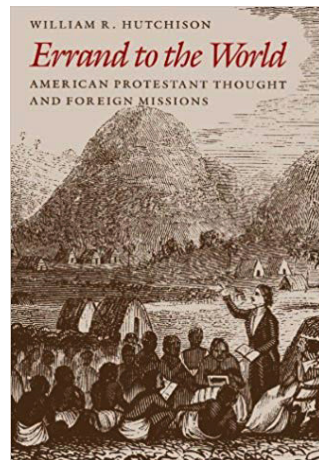
但第三代和第四代宣教士很多出生在中國，他們看待中國文化的眼光，多了一些熟悉感和同情心。當他們看見美國教會以西方文明的優越感來看待異族文化，就會予以批判。

1910年代還有兩件大事，推動了在華宣教事工向教育轉變。一是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中國社會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流動商業機會增加，很多傳統家庭開始願意讓子女從私塾轉入西式學堂。

第二件是1910年在愛丁堡召開的世界宣教大會，其口號為：“在這一代為基督贏得世界”。教會史學者們都認為，這次會議標誌著普世宣教運動進入高峰期。

到1914年，在華教會辦學的數目，比1888年增長了四倍。幾乎每個宣教站（mission station）都辦了一間學校。教育事工的擴張，讓更多有自由派傾向的宣教士加入。

哈金森教授（William R. Hutchinson）是美國教會史權威，他在《進入世界：美國新教思想和海外宣教》（*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一書中曾粗略估計，到1917年為止，在華宣教的美國新教徒中，超過70%都屬自由派神學陣營。宣教士建立的13所基督教大學，也成為新教育理論進入中國的實驗基地。



普世宣教運動和中國教會歷史之間的記憶，還有很多亟待考察的課題。✚

作者為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

掙扎與重塑

一本當代中國教會敘事的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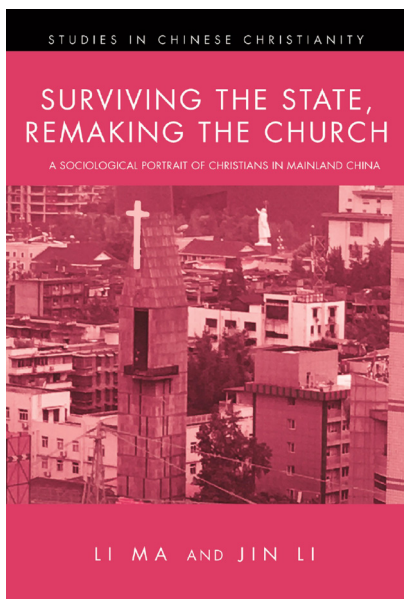
王俊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更替後，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政治事件頻發，但因當局的掩蓋和個體的恐懼，逐漸被淡化，甚至被遺忘。至於它們與屬靈生活之間的關係，更少被關注。隨著基督信仰在中國的復興，屬靈生活的歷史連貫性成為信徒的內在渴求，但在現實中卻被隔斷、壓制，得不到真實呈現。對於國外信徒和研究者而言，中國信徒這些年屬靈生活的狀況更如一團霧水。

如何透視49年之後中國大陸信徒的屬靈狀況？如何構建這段被遮蓋、扭曲、甚至遺忘的教會生活？如何呈現高壓環境中基督徒的選擇和掙扎？這些掙扎將怎樣重塑中國的教會和社會？這都是有信仰的學術人需要去探究的問題。

馬麗、李晉夫婦2018年的新著 *Surviving The*

State, Remaking The Church (暫譯《掙扎與重塑：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學群像》，本文簡稱《掙扎》)，用口述史的方式，挖掘1949年以來中國信徒在扭曲環境中的處境，反映中國教會的現實狀況，思考未來的走向，呈現上帝在中國的作為。(編註：



本書入選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2017年度十本最佳宣教研究書籍之一。)

作者採用直觀的敘述與訪談的記錄，配以深度的反思，內容富於啟發，可讀性強，是一部值得強烈推薦的當代中國教會史佳作，促使讀者去關注中國信徒的外部挑戰和內部掙扎。

外部挑戰來自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對信仰的敵對、分化、壓制、消滅、迫害和打壓等；內部掙扎則指信仰群體形形色色的回應：與政權合作與不

合作的；離棄信仰與堅守信仰的；消極迴避與積極回應的等。

中國教會的重塑還沒有完成，甚至可說才剛剛開始。未來上帝將如何塑造中國的教會，有待觀察，也值得進一步思考。

政治意識形態的陰影

1949年政權更替後，大陸基督徒所受到的意識形態挑戰無疑是巨大的。它所面對的，不再是儒家等傳統，而是一種總體性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儒家雖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功能，具狹隘性和排他性，但卻不是總體性的主義，不至於在每個環節上都控制人的思想，因此給了其他信仰很大的社會空間。但馬克思主義則不同，它是總體性的，要求絕對地整齊劃一，無論內外都是如此；若與其不同，就被視為錯誤，甚至犯罪。

在這種極權意識形態下，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錯誤。有神論與無神論截然對立，兩者的信仰立場、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勢同水火。因此，來自政治方面的逼迫不可避免。

《掙扎》一書的敘述重點，並不在刻劃意識形態的衝突。它沒有直接講述政權的意識形態與基督信仰的對立關係，而是透過背景介紹及受訪者的敘述，藉信仰的困境來呈現。如果說，信徒的信仰選擇、掙扎和回應是該書的明線，那麼，政治意識形態的挑戰就是它的暗線。雖是暗線，其重要程度卻不亞於明線。因為若不明白這條暗線，就沒辦法理解明線。

不難看到，在該書中，意識形態就像一個幽靈，纏繞在問題的方方面面。從1949年政權更替伊始，這幽靈就籠罩在中國社會和心靈生活上空，言語行為皆無法逃脫它的控制，思想意識也受到它的審查，甚至衣食住行都與之密切相關。

這種意識形態與堅持一神信仰、反對偶像崇拜、要按照聖經生活的基督信仰截然相反，格格不入。一場屬靈的戰爭由此展開。1949至1978年間，大陸的基督教經歷了被分化、打壓、消滅的過程。不少傳道人被處決，例如王志明牧師；更多被囚禁，例如王明道、倪柝聲等。很多信徒轉入地下，

在後極權主義無神論意識形態下，要選擇基督信仰、按照聖經原則來生活，依然非常困難。 Even now in the era of post-totalitarianism,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nd follow Biblical principles under the atheist regime.

成為後來家庭教會的種子。《掙扎》前兩章所描述或採訪的人物，是在這一背景中講述自己的信仰。

1978年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政權對社會管控的方式開始變化，不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故此，有人稱之為後極權主義。但當權者其實並未放棄極權主義，只是方式靈活了一些；其無神論立場和總體控制的思維並沒有改變。

不可否認，這些變化為信仰開放了不少空間，使得原來隱蔽在地下的教會慢慢浮出水面，且越來越公開，以至家庭教會是否登記，都成為各個教會在討論的問題。《掙扎》一書第五章的“雙城記”，作者深入呈現了不同地方對這種狀況回應的差異；其他各章也有涉及。

雖然改革開放讓中國的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化進程迅速，但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宣傳、洗腦教育、思想控制、文化審查等，都沒有多大的改變。基督徒在教育、文化、慈善、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挑戰和壓力，甚至遭到逼迫，《掙扎》一書對這些層面皆有鮮活的專題敘述。

總之，政治意識形態構成了本書的問題與敘事背景，也是造成中國大陸信徒困境的主要外在環境。這條線索是理解1949年後中國大陸屬靈生活不可疏漏的。

信仰選擇與內在掙扎

建國初期，政治意識形態高漲，它的烏托邦理想矇騙了不少信徒，連具有信仰背景的知識青年也難以分辨。林昭便是個突出的例子。她極其欽佩毛澤東，稱他為父親。很顯然，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並沒有完全去除當時信徒心中的偶像。在民族危亡的時候，克里斯馬型政治領袖很容易成為眾人的偶像。在這個意義上，當時許多參加三自運動的信徒並不完全是被迫的，也有主動的成分。

但是，隨著極權政治的殘酷與荒謬日益明顯，原本迷戀政治意識形態的人開始覺悟。《掙扎》中提到的楊小凱和林昭，便屬於這一類。楊小凱出身於紅色家庭，但由於好學和愛思考，加上個人和家庭在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使得他在文革期間就有所醒悟，也為他後來皈依基督教作了預備。林昭小時在基督教學校就讀，在遭受殘酷迫害之後，重新悔改經歷神；她的信仰回歸實不難理解。

在殘酷的政治運動中，還有不少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醒悟過來，選擇了基督信仰。就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來說，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書中講述了一位張醫生（化名）的故事：張的父親本為地下

黨，但因沒有證據，遭懷疑曾為國民黨做事，被劃為右派。張因此不能上大學，又無法參加紅衛兵，只好偷偷學醫；政治成分不好，對象也不好找，這讓他非常痛苦。在極困難的時候，他想到了總是很喜樂的李老師，向他訴苦；李老師告訴他自己是基督徒，並向他傳福音。他成了文革中皈依的基督徒。這種例子顯然不多，但上帝確確實實會在黑暗的時代中行這樣的神蹟。

改革開放之後，信仰基督教雖然不如之前危險，但來自意識形態的挑戰依然很大。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基督信仰才逐漸進入更多人的視野。之所以如此，並不是意識形態的控制放鬆了，而是因為這事件讓很多原來對政權抱持幻想的人徹底絕望。對他們而言，這種意識形態已經破產；政府對此事的刻意掩蓋，更讓很多人感覺沒有出路。這時，曾經被忽視或藐視的基督信仰，開始進入這些人的視野，重塑了他們的信念。在本書第三章中，作者講述了幾位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或旁觀者轉向基督的故事，並總結了該事件對歸信基督的影響。

不難看到，在政治意識形態陰影下，中國仍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隱密信徒。在1989年之前，他們的屬靈生活那麼微弱；可是之後，卻出現星火燎原之勢，並進入了公眾視野。在這個意義上，天安門事件可以說是改變中國社會信仰的一個里程碑。

此後，政府更多利用民族主義來操控大眾，而人們則尋找各種精神信仰。民間宗教、佛教、法輪功等都非常興旺，基督教也蓬勃發展。雖然受到各種壓制，但依然勢不可擋。

不過，基督教的勃興並不意謂信徒就沒有掙扎。恰恰相反，在後極權主義無神論意識形態下，要選擇基督信仰、按照聖經原則來生活，依然非常困難，充滿各種挑戰。在《掙扎》中，作者記述了來自政黨、民族主義的壓力，以至基督徒在婚姻、教育、職業上面對的困境。譬如：能不能入黨、要不要退黨；被指責崇信洋教、遭受迫害的威脅；選擇對象時，能不能考慮非信徒；能不能墮胎；是否送孩子上意識形態強大的公立學校；要不要在政府單位擔任公職，等等。許多活生生的故事，呈現了中國基督徒外在的困境和內心的掙扎。信仰帶來新的價值觀，但要按照信仰生活，總是舉步維艱。

教會在掙扎中艱難重塑

1949年的政權更替，讓中國教會經歷了重塑。一部分教會與政府合作，組成“三自愛國教會”；一部分轉入地下，堅守純潔的信仰。而文革

中國教會的當前成長和塑造，不僅決定著教會的未來，也可能決定著中國社會的未來。
The growth and making of the present Chinese church will determine their own fate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the society.

期間，無論是“三自”教會還是地下教會，都同樣被取締、逼迫。

改革開放之後，“三自”得到恢復，地下教會也漸漸浮出水面，成為家庭教會和新興城市教會。隨著社會的變遷，中國教會正經歷一次新的重塑。其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為：政教關係、“三自”和家庭教會的關係、公開或隱蔽、登記或不登記、傳統敬虔神學與新進加爾文主義的爭論等。《掙扎》從歷史背景、信徒的掙扎和教會的立場，呈現了當代中國教會方方面面的重塑。

首先是信徒與政治環境的抗爭。原本抗爭的主角是家庭教會，但隨著2014年浙江大規模拆毀十字架，和政府對“三自”教會的進一步控制，“三自”教會與政府的和諧外衣也逐漸剝離。基督信仰與無神論意識形態的價值衝突無法消除，政教關係成為中國教會無法迴避的問題。2018年新宗教條例的實施，必將進一步考驗中國信徒的政教關係。

通過將上海與成都兩個城市教會作對比，《掙扎》讓我們看到當代中國基督信仰的地域差異性。在歷史上，上海是“三自”運動的發起地；在當代，它又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因此政府的管控特別嚴格。這座城裡的地方教會傳統影響力相當大，因此教會顯得較為封閉。成都卻不同。2008年汶川地震，教會積極參與救災，因而與政府建立了較為信任的關係，教會也得以更加開放，成為中國信仰最為公開和活躍的地區。

關於登記與否、或如何登記的問題，書中也有所提及。北京守望教會與政府打交道多年，成為各地教會的借鑒。2011年守望教會的努力失敗，按

照法律程序登記似乎難以實現。隨著新宗教條例的實施，這個問題也將繼續考驗各個城市的教會。

書中還專闢一章，討論加爾文主義在當代中國教會受到歡迎的現象。中國原有的敬虔神學較為封閉，只關心個人得救、不關心社會和公義等問題。隨著城市教會的發展和新一代領袖的出現，這種神學無法滿足他們。由於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關心教會與社會的互動，年輕一輩的領袖要求體現基督徒世界觀的整體性神學。這時，強調總體世界觀與教義的改革宗神學進入他們的視野。

近年來不少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牧者回到大陸，改革宗神學的譯介也愈來愈多，因此改革宗受到不少教會歡迎。但是，由於對這派神學的認識不夠深，誤解與問題也隨之產生。雖然有不少教會確實用改革宗神學重塑了教會結構，但更多教會還是標籤式的，各種半生不熟或囫圇吞棗式的加爾文主義，在教會界產生不少問題。例如，與傳統敬虔主義激烈衝突，導致教會分裂；獨尊加爾文主義，排斥其他神學，指責其信仰有問題；濫用神的主權教義，變成某些教會領袖專權，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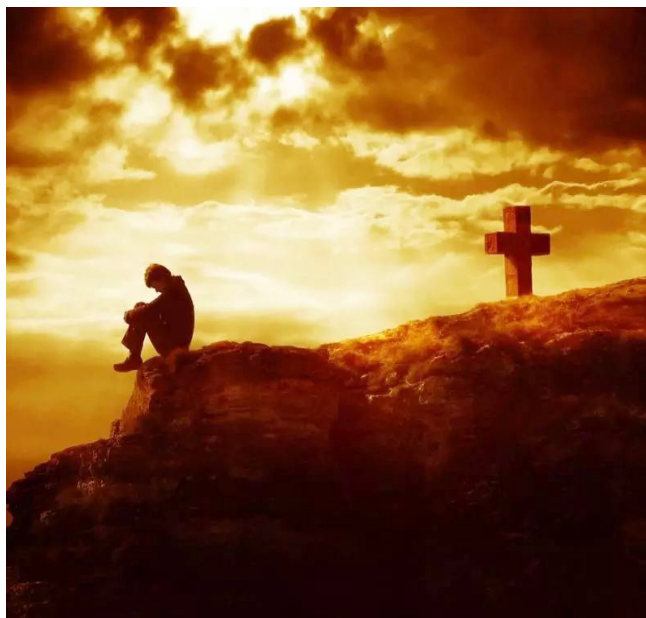
中國教會的神學重塑才剛剛開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教會必然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可以說，中國教會的未來走向將決定社會的未來。

傳統中國是家國一體，社會非常微弱。共產政權建立之後，家被削弱，意識形態化的國成了一切的中心。權力的全面控制，使社會更加縮小。如何在缺乏社會傳統的中國建立起健康的公民社會？這問題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認，基督教的興起、基督徒的選擇和基督教的重塑等，將在其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從新近意識形態的變化所導致的社會效果中不難看出。

近年來，維權群體、NGO被打壓，言論控制加強，社會空間被壓縮，很多自由知識分子失聲，各種社會組織或解體或停頓。基督教雖然也經受了考驗，依然發展很快，成為支持中國社會自由和社會良心的脊梁。正因如此，中國教會的當前成長和塑造，不僅決定著教會的未來，也可能決定著中國社會的未來，非常值得關注。

《掙扎》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教會與社會的窗口，透過它，我們看到了神的作為、信仰的力量、生命的悸動和教會與社會的重塑。✚

作者是哲學博士，現今在加爾文神學院就讀



辯證思維與屬靈生命的成長

天靈

在後現代社會中，學科分化日趨狹窄和瑣碎。如果沒有足夠的哲學或文理教育背景，無論學歷多高、生活經歷多豐富，都難以體會到生命的辯證邏輯，而會不自覺地落入直線思維的荒謬陷阱與悲劇之中。

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以推石上山、永無止境的苦役情景，描述人生難以自拔的盲目追隨，正是人類的寫照。甚至即使是作為神兒女的基督徒，也難以不跌入這樣的圈套中。

但是，在中國大陸受過教育的人，如果沒有忘記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課上所學過的辯證法原理，並且能以此來理解基督信仰中屬神的辯證真理，或許便可以認識神對人類的美意，明白神所賜從個人到列國的救恩，以至能擺脫荒謬的生活與命運。

辯證法的認知方式

筆者首先需要澄清：辯證法並非僅只源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人類自古就有的一種認識方式。不同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臘、古代中國和古代印度等，都曾出現辯證的推理；而這種認識形式在歐洲近代哲學發展中日臻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只不過是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概念，並應用到社會發展的理論之中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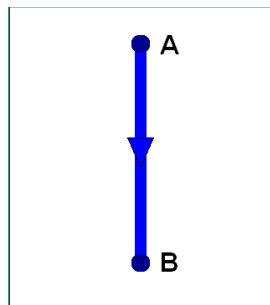
作為一種深刻的認識形式，辯證法本身並沒有意識形態的偏向。曾經接受過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基督徒，必須認清這一點，並且需要學習剝離。我們不必因為在信仰上歸向基督，而將從前所受教育中有意義的認知方法整個拋棄；若是如此，則無異於倒洗澡水竟將孩子一同扔掉。

辯證法的認知方式就是強調：表面上矛盾的事物之間，存在本質上的統一關係。貌似對立事物之間卻具統一關係，這種認識能幫助我們穿透事物的現象，而看清其本質；識透事物之間表面的割裂性，而確信其內在的整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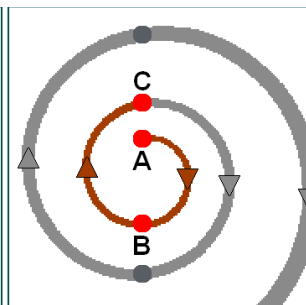
與直線邏輯的比較

與辯證認識方法相對應的，是直線邏輯思維。十分顯然，直線邏輯是更為容易理解的認識方式，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推理方式，但是，它所能揭示的真理，通常是淺顯和簡單的一類，並無法揭示更為深刻和複雜的真理。

直線邏輯



辯證邏輯



以這兩種不同的思維邏輯，來檢討人在基督裡所領受的救恩與生命，就會發現：基督徒所以會出現真理與實踐巨大的落差，其實乃是反映出：對信仰的辯證真理認識、與對信仰的直線邏輯實踐，兩者之間有深刻的鴻溝。

基督信仰中的直線邏輯

什麼是直線邏輯所理解的基督信仰？即直線的一端為人，另一端是神。

人的本性是有罪的。罪不單是指道義或法律上的作惡，而是指人從內到外（包括意志和力量）生命的不完全與有限性，以致必然有的罪性本質和所導致的惡性後果。不管人自己意識到與否，這種本質和後果都是真實存在的。因此，人的生命充滿了匱乏與需要，難處與無助，並且需要被拯救。

而直線另一端的神，是創造人類的全能者。祂對人的本性和處境一清二楚，是全知、全能和全愛的神，也是人類天上的父。祂渴望挽回人的生命，更渴望挽回我們與祂的親密關係。因此，祂為軟弱無助的人類預備了浩大的救恩和無限的祝福。

作為流離失所的浪子、重新歸回天家的小孩，我們渴望神的祝福。這是天父所喜悅的，也是祂的應許。我們的需要也與父神的榮耀相契合，當神的兒女與祂恢復其樂融融的美妙關係，便能將神的榮耀彰顯在宇宙中。

這是對信仰初級階段的瞭解。這種認識是需要為基礎。保羅曾形容屬靈的嬰孩有吃奶的階段（希伯來書5：11-12），許多人在初信之時都經歷過一段信仰蜜月時期。

基督信仰中的辯證思維

假如人類與神始終是在伊甸園裡，人就不需

不少基督徒……由於不明白其中含有難解的辯證信仰邏輯，因此看不到“捨己”和“背十字架”隱藏的祝福。Many Christians . . . do not understand the dialectical logic involved in the faith. Hence they cannot see the hidden blessings of the commands to “forfeit oneself” and to “take up the cross.”

要拯救，因為那是已經與神完全同在的狀態。但現實是，人類因為始祖犯罪而被逐出伊甸園，因此，人類至今需要被神所拯救。於是，辯證邏輯（又稱悖論邏輯）進入基督信仰中，就是耶穌基督作為神子降臨人世，為人類之罪孽受死，並以自己的死戰勝罪惡，再以自己的復活勝過死亡。基督以自己的生命向我們見證了救恩的悖論性特徵——即以祂的受死挽回我們的生命，彰顯祂對我們的厚愛。

假如我們認識神之後，馬上離開這個污濁和破碎的世界，全然進入完美的天國，我們便不需要效法基督，在世上活出為愛而死的生命。然而信主之後，我們仍生活在基督還沒有再來的時代，新天新地中持久的天國生活還沒有開始。在主耶穌再來之前的日子，我們需要過“在世而不屬世”的生活（約翰福音17：15-16）。這個事實對我們具有挑戰意義。

主耶穌離世前賜下使命：“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路加福音24：17），“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19-20）這就帶出基督門徒所需要進入的辯證信仰邏輯，和所要活出的辯證信仰生命。

從得救的時候開始，信徒就進入到主耶穌復活與世界末了之間的時段裡，因此需要效法基督的生命，過著背負十字架的生活，如同主耶穌的教導：“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馬可福音8：34-35）

本末倒置與荒謬後果

然而，不少基督徒卻始終持著信仰初階的直線邏輯，面對主耶穌“捨己”和“背十字架”跟從祂的教導，完全不能理解。由於不明白其中含有難解的辯證信仰邏輯，因此看不到“捨己”和“背十字架”隱藏的祝福。

直線邏輯無從闡釋“贏得生命”與“喪掉生命”之間的弔詭性辯證關係，因此，無論教會如何苦口婆心地教導和呼籲，不少信眾卻只聽而不聞，不願捨己和背負十字架。對於這關乎個人生死得失的辯證加減法，一些人視若無睹、無動於衷，背後正是這個原因；若能瞭解，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應驗了先知以賽亞所描述的後果，“你們聽是要聽



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以賽亞書6：9）

沒有捨己和背負十字架的跟從行動，我們雖似乎輕易就獲得了神兒女的名分，卻很難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跟從耶穌的腳蹤固然談不上，就連與世俗文化、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劃清界限，也作不到。這樣的基督徒停留在嬰孩的信仰階段，裹足不前，並拒絕長大，成為門徒。他們順理成章地以為，被人帶入教會，豈不就是為了領受祝福、滿足個人的需要？教會豈不就是講神的愛嗎？

若對信仰的領會只是到此為止，這樣的信仰必然難以傳承給下一代，因為在家人面前，我們無法見證屬神生命的榮美。至於主耶穌離世升天前所交代的大使命，就是要基督徒向異邦列國傳遞神的大能救恩，對這樣的信徒更成了無稽之談。

我們是否會成為今日中國人中的第一代基督徒、同時也是斷代的基督徒呢？寶貴的福音失落在我們的手中，原因為何？教會無延續性的老化危機，有什麼良好的解藥嗎？“真理”與“信仰消費主義”到底有什麼不同？個人信仰的成長和群體信仰的傳承，只是認識上的問題嗎？

辯證邏輯與屬靈生命

今日教會（包括美國教會）確實面臨上述現實。在面對這樣的挑戰時，首先，我們的思維邏輯需要有一個飛躍，就是從直線思維進入到辯證思維，並以辯證邏輯解讀“捨己”和“背十字架”。

這種邏輯上的飛躍，能幫助我們看到辯證的弔詭邏輯所揭示的複雜辯證生命現象。或許有人因而願意脫離嬰孩階段，渴望進入長大成人、能有所擔當的成熟生命階段。

更弔詭的是，純粹理性的認知並不必然帶來實踐上的飛躍。從辯證邏輯上理解了“捨己”和“

背十字架“的真意，並不必然帶來行動上的跟從。因為理性邏輯的推導，並不完全等同於實踐。

實踐上的飛躍，需要的是信任（信心）和順服。這才是信仰可以從嬰孩邁向成人階段的重要條件。因此，對於捨己和背十字架，主耶穌給我們的是一道直線性的命令——就是“跟從”。不需要理解，只需要順服。因為沒有順服，我們將永遠無法經歷到辯證邏輯推導出來的“捨己”和“背十字架”背後的祝福。

不是我們的理解幫助基督徒獲得生命的成長，而是順服地實踐主耶穌命令，生命才能踏上成長的旅途，才有希望長大成人，如同小孩子面對父母和老師在身心靈各方面的人餵養和教導，沒有質疑，只有領受，才可以長大成人。

主耶穌為拯救世人降世，甘心放下天家進入世界。唯有長大成人、生命像基督的人，才會如此效法基督，走出自己的安樂窩，在世上為主作光作鹽，向萬民萬邦見證神的救恩，為主、為福音、為愛，活出有擔當、願付出，甘赴死的生命。

這樣的人必真正得著在神面前的豐盛生命，如同聖詩“使我作你和平之子”中所唱：

因為在施捨他人時，
我們獲得施予；

因為在寬恕他人時，
我們獲得寬恕；

因為在喪失生命時，
我們獲得永恆！

作者曾任北京大學副教授
現為北美彌賽亞神學院教師

困境與美德 讀《自信的多元主義》有感

李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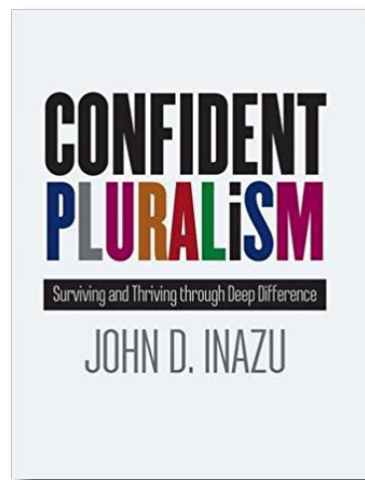
近些年來，關注國際新聞的人都會發現，深深的分歧和排他意識正困擾這個世界。性取向、墮胎、移民、種族、宗教等存在已久的矛盾，不但沒有緩和，而且有越演愈烈之勢。

對世局舉足輕重的美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極端言論頻頻出現，便是典型的例子。美國國會和最高法院內部，由於派系分歧，長期以來遇事裹足不前，也早已不是新聞。美國主流媒體為了追求市場份額，一味迎合受眾群體的既有偏見，導致不同社群的隔閡不斷加深。

多元主義的理念一度曾是美國社會追求的理想，但到了今天，如果沒有徹底破滅，在上述嚴峻的現實面前也顯得蒼白無力。

華盛頓大學法學與政治學的教授約翰·稻津（John D. Inazu），2016年出版的《自信的多元主義》（*Confident Pluralism: Surviving and Thriving through Deep Difference*），卻對這一挑戰作出有力的回應。這部僅有百餘頁的書，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發行不久，即引起美國國內廣泛的關注，短短數月間，各界已組織了十餘場專題討論。

作者在副標題中表明，他所要探討的是如何“從深層差異中尋求生存和發展”，這正是美國人民當下亟待反思的議題。



可貴的傳統理念

全書開篇，作者引用了法國思想家盧梭的名言：“我們根本無法與那些在我們眼中被詛咒的人和平共處。”在作者看來，盧梭的斷言是對多元主義實踐的否定。然而作者與盧梭針鋒相對，主張人們不僅能夠、而且必須從彼此的深刻差異中學習共存之道。

“自信的多元主義”是作者對這一獨特的美國政治傳統所做的概括：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政治實踐中，儘管充滿著各種失敗和倒退，但多元主義的理念已經深深熔鑄在這個國家基本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生活中。

對多元主義的自信，使得美國人民從粗暴地要求社會一致、和任由相對主義氾濫，這兩個極端之間，成功地開闢出第三條道路，就是努力地學習真誠相待、彼此理解和尋求適度的共識。

全書共八章，分為兩部

每個人在所投身的公民行動中，都要充分表現出寬容、謙卑和忍耐的美德。
Every person participating in civil action should demonstrate the virtues of tolerance, humility, and patience.

分，分別處理憲政制度和公民行動領域中的多元主義議題。

批判與規訓

前四章，作者首先追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針對言論、出版、集會、請願和宗教崇拜自由等方面所立的基本原則。這既是權利法案的核心內容，也是維繫美國多元主義傳統的基石。

隨後，作者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憲法框架，就是由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司法解釋和判例所塑造的。

首先，相對於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最高法院長期以來缺乏對公民結社自由權作出充分保護。其次，在規範公共論壇和運行程序方面，現有法律的種種漏洞，使政府官員可以輕而易舉地進行操控。最後，在為公民社團提供資助或免稅支持時，政府常常受制於自身的意識形態預設，無法公正地一視同仁。

可以說，在這一部分中，作者將針砭時弊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批判現實的同時，作者也沒有忽略改進的努力，每一章的結尾都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這些建議的形式類似法律

條文，其內容則是對政府權力使用的規訓。

第一，作者指出：除非牽涉明確的公共利益，政府官員不得隨意干涉公民社團的成員資格、領導方式和運轉機制。第二，政府應當尊重公民在公共論壇中表達不滿和反對的行為。除非出現迫在眉睫的危險，否則政府不應該限制公共論壇中的言論。第三，當政府為公民社團提供資助，以便促進思想多樣化的發展時，不應當將公共資源投放的標準侷限在自身意識形態的正統範圍內。

作者提醒說，作為建議，這些原則本身並不是絕對的，因而需要握有政府權力的官員，在各種複雜的處境下，能夠做出符合多元主義期待的明智選擇。

實踐與公民美德

堅實的憲政秩序為多元主義提供了法律和政治保障，但這還遠遠不夠。健康的多元主義更需要公民的支持，即普通民衆在面對分歧甚至矛盾時，能夠按照正確的方式，做出正確的行動。

在現實中，很容易看到人們只願意傾聽與自己立場相似

的聲音，而選擇忽略、貶低甚至侮辱意見相左的人。作者認為，這些都是處理分歧時的錯誤立場和做法。

《自信的多元主義》則堅持另一種信念，即我們可以承擔彼此的差異，進而為對話和說服對方創造機會。踐行多元主義的信念，並不是靠著司法的要求，而是需要民衆認定：社會中的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因此，不論公開演講、集會遊行、還是罷工抗議，每個人在所投身的公民行動中，都要充分表現出寬容、謙卑和忍耐的美德。

作者在全書後四章中，主要便是闡釋公民美德的實踐方案與價值。在多元主義所推崇的三項公民美德中，寬容是最重要的一項。

寬容意味：面對深刻分歧，還能接納他人。踐行寬容絕非易事。儘管如此，作者認為，可以努力邁出重要的一步，即把意見相左之人和其觀點分別對待。寬容的美德要求我們尊重對方，尤其是在批評其觀念的時候。

謙卑則需要能自我反省。我們必須認識到，自己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只能在特定傳統中自圓其說；對在該傳統之外的人而言，則往往不能成立。換言之，我們能夠謙卑的前提，正是認識到理性和語言的侷限。我們無法讓所有人都理解或認同我們的信念。在面對分歧者時，這種認識可以消除我們的驕傲，幫助我們更加認真去傾聽和理解他人的觀點。

忍耐的養成，包括了自我約束和堅持不懈。在處理分歧時選擇忍耐，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對話和說服的工作通常不



有些人曾克服巨大困難，頑強地選擇接納、包容……。這些事件美好地詮釋了多元主義的寶貴精神！
In the past there were people who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acceptance and forbearance despite great obstacles. . . . They illustrated the precious spirit of pluralism.

能一蹴而就。倘若缺少忍耐，我們就會選擇強制甚至暴力，去對待看法相異的人。

政府與民衆的挑戰

縱觀全書，作者巧妙地將歷史、現實、思想、制度等元素編織在一起，所勾勒出的政治價值觀極富吸引和感召力。

自信的多元主義意味著不同的個體和人群可以彼此共存、互惠和共同發展。這既是美國社會的寶貴傳統，也是美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關鍵。

自信的多元主義對執政者和普通公民都具挑戰。對前者而言，如何汲取過去數十年的教訓，運用行政和司法權力，去培育多元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民社團和公共論壇，為異議人士和少數派提供生存保障，是執政者無法迴避的責任。

對後者而言，如何在公開言論和集體行動中，跨越意識形態的侷限，去聆聽和理解對方；如何避免人身攻擊，並在遭批評時不急於辯護甚至反彈；如何避免肆意擴大分歧，而以寬容、謙卑和忍耐的胸懷，去追求彼此可能存在的共識；這些目標都極富挑戰性，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能踐行。

至於美國社會和人民是否有勇氣和智慧去實踐多元主義的理想？對此，作者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畢竟現實遠不盡如人意。無論是在憲法的實踐還是在公民行動中，對主流的無條件擁護、對少數缺乏同情和理解、對異議的排擠和踐踏，依然盛行。但作者堅信，美國人民還有憲法的傳統和周圍的典範可以依循。有些人曾克服巨大困難，頑強地選擇接納、包容，

甚至關愛那些曾經傷害、或正在傷害自己的人。這些事件美好地詮釋了多元主義的寶貴精神！

雖然過去的個案不足以證明多元主義正在走向成功，但只要人們沒有失去盼望，未來就不能過早地蓋棺定論。

難能可貴的是，身為學者 and 評論家的作者稻津教授，沒



有採取置身事外的態度。他積極投入與各種群體的對話，接受來自各方的質疑和挑戰，並盡最大努力去理解立場不同的個人、群體和機構，瞭解其行為及其背後的理念，滿懷希望地投身政治實踐。

稻津教授做到這一點，其實並不容易。他是日裔學者，書中悲痛地回憶自己父輩在這個國家的不幸遭遇。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出於安全考慮，將日裔公民大規模遷移到遠離城市的集中營生活，作者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出生在美國，畢業於名校、有高尚的工作、已經成家的日本人，幾乎在一夜之間被剝奪了工作、


財產和自由，在集中營度過了兩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同一時期被剝脫基本公民權利的日裔美國人，大約有十一萬。

昔日的苦難，是為了照亮今日的現實。然而，在今日兩極分化的美國，有誰能擔保歷史的悲劇不會重演？

思考與啓發

這薄薄一本書，帶給讀者很多思考和啓發。透過作者犀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清美國社會的負面現實和各種暗流。在作者的擔憂中，我們可以體會美國傳統的失落。

或許有人會批評作者的樂觀主義，認為他對美國社會矛盾的嚴重性和社群差異的嚴峻性認識不足。甚至有人或許會藉此彰顯自身理念和制度的優越。但如果我們真的願意領會作者的匠心，或許可以暫時超越國別和文化的距離，將反省的對象從國家、社會甚至他人轉移到自身，嘗試在自我的語言和行動中，培育寬容、謙卑和忍耐的美德。

畢竟，作為在世界上生活的凡人，我們都有各自的侷限，我們也都會犯錯。這不僅是我們和他人之間共同點，也意味著我們越是努力地尋求相互理解，也就越能夠促進彼此的幸福。為此，我們需要去嘗試。 

作者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





一些神學問題的中國視野

王志勇

2018年孫毅長老在我家過春節，期間我們就中國教會的許多神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通。茲將交流內容整理為文，求教於同仁同道。

聖約與律法

聖約神學涵蓋整本聖經的啓示和世界史。耶和華上帝是立約的上帝，耶穌基督是聖約的中保，聖靈上帝是聖約的執行者，聖經是上帝與人立約的約書。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的巔峰成就之一，就是把聖約神學寫入《威斯敏斯德信條》，使其具正式信條的地位。

聖約乃是聖經啓示的基本範式。世界歷史不變的規律是：“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換言之：“守約者昌，背約者亡。”順服上帝，核心的標記就是順服上帝的聖約和其中的律法。

《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第39到40問為：“上帝要人盡什麼本分？上帝要人所盡到的本分，就是順服祂顯明的旨意。上帝起初向人啓示了什麼，作為順服祂的標準呢？上帝起初向人啓示了祂的律法作為順服祂的標準。”

對於聖約和律法規範功用的強調，乃是清教徒神學的精華。改革宗先輩強調上帝的約法，將神學與社會現實聯繫起來。上帝的約法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原則和標準。聖約是上帝所賜愛主愛人的指南、治理全地的工具、判斷善惡的標準。要建立合乎上帝旨意的聖約共同體——包括家庭、教會和國家，必須以聖約為藍圖，以律法為標準，也當以耶穌基督為獨一的聖約保證者和律法成全者。

約法的功用

孫教授指出，改革宗神學強調律法的第三大

功用，就是“約法的功用”。上帝的律法不是機械的規條、抽象的字句，而是界定我們與上帝之間位格性的關係。上帝的律法反映上帝的性情和旨意，是我們效法基督、愛主愛人、培養品格的依據。約法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教育上帝的子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2）。

上帝賜下律法，首先是為教育我們。上帝對摩西說：“我要將石版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出24:12）。因此，摩西在辭世之前交待：“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萬萬聖者中來臨，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他疼愛百姓。眾聖徒都在他手中。他們坐在他的腳下，領受他的言語。摩西將律法傳給我們，作為雅各會眾的產業”（申33:2-4）。

神的國度與文化使命

我多年的心得為：聖約首先凸顯的，乃是上帝的主權和大愛。因為上帝不需要與我們立約，但祂卻屈尊俯就，通過立約，使我們成為自由自願、平等立約的盟約夥伴，並且強調自己“守約施慈愛”。這實在是上帝賜給我們榮耀和尊貴為冠冕！

既然上帝立約守約，人就當遵守聖約和律法，建立憲政法治、尊重人權的國家和文明。因此，我們愈高舉上帝及其約法，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就愈得到尊重。否定上帝的存在及其約法的規範性，人的自由和權利就喪失了絕對的保障；甚至會落在各種惡法惡規的轄制之下。

上帝不僅按照祂的形象創造人類，還把治理全地的權柄和使命賜給我們（創1:28），又差派祂的獨生愛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捨命，代表並代

在聖約和國度的框架中，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子民，……使命是代表上帝來管理天地萬有。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Holy Covenant and the Kingdom of God we recognize our identity as God's people . . . and our mission as caretakers of the universe.

替我們成全了上帝的約法，使我們重新與上帝和好，成為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聖約必須與耶穌基督的救贖相聯，並與上帝賜人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相關。由此觀之，聖約不僅是法理性和關係性的，也是使命性與合作性的，使我們能與上帝同心同行同工，在人間建立各種形式的聖約共同體（如家庭、教會、學校、國家等）。先知彌迦曾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6:8）。

其次，聖約還應與上帝的國度相聯。加爾文強調，上帝立約的模式是：上帝要作我們的上帝，我們要作上帝的子民。上帝作我們的上帝，是凸顯上帝主權的恩典——祂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我們作上帝的子民，乃是律法的精義——我們行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典相稱，按照上帝的律法來愛主愛人。這一模式不僅是對聖約框架最經典的概括，也是對國度框架的最好概括。

福音乃是國度性的，宣告上帝的審判，要人認罪悔改。上帝的國度指上帝的主權和統治。先知以賽亞宣告：“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祂必拯救我們。”（賽33:22）重生就是得見和進入上帝的國度（約3:1-8）。聖靈賜給我們新心，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們心版上（結36:26-27）。

律法的精義是作訓蒙的師傅，帶我們來到基督面前，使我們因信稱義。我們當在基督裡默想、愛慕、遵行上帝的律法，這是蒙恩得救之人的基本標記：“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1:2）。

在國度模式中，福音和律法呈完美的平衡。律法是上帝確保我們自由和幸福的標準，福音乃是為我們打開上帝國度的鑰匙。

第三，聖約有五大要素，就是立約者上帝、守約者選民、標準、賞罰和延續。這五大聖約要素直接與國度五大要素對應起來，就是國王（上帝是大君王）、國民（選民是國度的子民）、國法（律法是標準）、國格（賞罰體現上帝的主權）、國運（上帝國度的更新與發展）。這使得基督教神學成為治理全地的生命之道，使我們在各種形式的契約關係中——婚姻、教會、商務、教育、慈善、國家等，都能榮耀上帝。

今世的應用

在政治方面，首先我們必須尊上帝為大。世

上的國不是我們首要的服膺對象。我們要順服上帝的旨意，以上帝的律法為大為尊。這乃是基督教公共神學的精髓，是中世紀以來大公教會一直強調的正傳，卻為今日教會所忽略。

我們也要有明確的賞罰觀。法國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其實乃是否定上帝所啓示的賞罰，混淆是非，最終必然導致可怕的報應：“定惡人為義的，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箴7:15）。

我們要深信上帝的國度必然降臨，最終世界歷史的導向和結局就是：“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11:15）。

在聖約和國度的框架中，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子民，地位乃在上帝之下萬有之上，使命是代表上帝來管理天地萬有。

靈修神學的進路

在靈修神學方面，中世紀密契派注重上帝的大愛，常說上帝或基督是我們靈魂的良人，靈修的最高境界就是個體靈魂與上帝位格生命性的合一。這種合一不是終極性、本體性的，而是一種生命的連接，就如燃燒的木炭完全具備火的屬性一樣。

密契派指出了靈修的具體路徑和階段。初習者為煉路階段，主要是對付自己顯明的罪，向罪而死；成熟者為明路階段，培養屬靈美德，向義而活；完全者為合路階段，完全以基督的心為心，個人意志全然降服於上帝的旨意。

基督徒的靈修是以重生為起點，因此與異教徒的修習截然不同。孫教授特別強調重生的重要性。重生之人分別為聖的過程，既注重造就內在的美德，也注重追求外在的善行，把“內聖”與“外王”結合在一起。儒家強調內聖外王，但靠自身修養做不到。然而重生的基督徒能實現古人心儀卻無法實現的道德與人格理想。

基督徒的靈修不是在修道院或僻靜之處進行，而是落實和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加爾文強調，整個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衛斯理強調，世界就是我們的牧場。我們要在世界之中體驗上帝的同在，塑造我們的品格，完成上帝的使命，彰顯上帝的榮耀。

基督徒必須加強靈修的功夫，否則就會在面對試探和逼迫時徹底崩潰。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教會面對殘酷打壓時，很多牧者跌倒，甚至賣主賣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深度的靈修，長期只以傳

靈修神學能幫助我們正確面對逼迫。
Devotional theology strengthens us to face persecution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福音的事工為導向。這是今日家庭教會當特別注意的。

靈修神學能幫助我們正確面對逼迫。如果我們只定睛於外面的逼迫，卻沒有意識到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就會不知不覺聚焦在政治問題上，甚至會誇大自己所受的苦難和危險，以此來遮掩自身和教會內部存在的問題。



另外，中國教會的狀態好像當年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在上帝的管教之下。因此，我們當學習但以理及其三友，不僅堅持遵行上帝的律法，不吃不潔淨的膳食，不向金像叩拜，並且與外邦君王維持有理有節有情的關係！當但以理被人投到獅子坑裡的時候，波斯君王大流士“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籌劃解救他”（但6:14），他能在外邦君王面前有這樣的影響力，確實有上帝所賜特別的勇氣、智慧和溫柔。

我們需要深刻的靈修，來認識、消除自身的狂妄，更多接受上帝的雕琢和護理。如此，即使在政治困境中，我們仍然能在愛心和智慧上有美好的見證。

世界觀與時代性

基督教神學要更多歸回聖經，並且與現實生活相聯繫。二十世紀初自由派神學所以大有影響，就是因為他們直接觸及時代問題；基要派神學和教會不斷被邊緣化，原因之一為信息喪失了與時代和文化的相關性。

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巨擘巴文克面對的掙扎為：自由派關心社會和文化，但卻偏離教會與正統神學；基要派持守教會與正統神學，但卻與社會和文化脫離。法國大革命之後興起的新加爾文主義，要將古老的加爾文主義現代化，使它重新成為改變文化、塑造文明的力量。因此，巴文克針對啓蒙運動之後的種種哲學與神學思潮，重新闡釋改革宗信仰。

凱波爾更在《加爾文主義講座》中，直接把加爾文主義與世界觀聯繫在一起，強調其精髓和力量乃在提供基於聖經的整全世界觀。凱波爾自身身體力行，創辦報紙和大學，參與組建政黨，反對以法國大革命為範式、無神的暴力革命。凱波爾又參與公共選舉，當選為荷蘭首相。

杜伊維爾更上一層樓，直接提出“改革宗哲學”，其《理論思維新批判》直接反對各種形式的“自法性思維”（autonomous thinking）。他提出以聖經啓示、改革宗神學所強調的創造、墮落與救贖的框架，取代希臘哲學（強調物質與精神對立）、中世紀和羅馬天主教哲學（強調自然和恩典對立），強調基督徒當建立整體性、系統性和有機性的思維體系，全方位地更新社會和文化。

中國教會學習改革宗神學，不能侷限於十七世紀的信條與教理問答，必須學習合乎聖經的哲學、法學、政治學、史學。沒有哲學素養，就無法有效思考；沒有法學素養，就無法掌握法律常識；沒有政治學素養，在教會治理上就會出問題；沒有史學素養，就不會正確看待聖經與教會歷史，難免不斷重複前人的過錯。

新加爾文主義把改革宗神學與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使基督徒神學重新成為強有力的世界觀體系，能夠捍衛、更新、建立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為特徵的基督教文明。

中國教會不能單依靠翻譯來建構神學，必須注重本土化和處境化的創作，才能真正服事我們所處的時代。當然，中國教會的神學根基還非常淺陋，必須謙卑學習並繼承西方教會的正傳。在向西方學習時，不能食洋不化，必須分清何為時代性、處境性的，何為根本性、基要性的，才能抓住大局和精義，求同存異。

借鑒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我們應當把基督教神學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建構中國基督徒世界觀和文明論，不僅注重個人靈魂的得救，也兼顧社會與文化的更新。

中國教會的需要

至於中國教會的需要，在神學上需要處理三大問題。首先是政教關係；其次是各種神學傳統融合的問題——尤其是敬虔派傳統如何與改革宗神學融合；第三是普世宣教——中國教會承擔起責任來。

如果政教關係和神學融合這兩大問題未得澄清，我們就無法在神學和制度上完成建設，而宣教

如果政教關係和神學融合這兩大問題未得澄清，我們就無法在神學和制度上完成建設，而宣教也必流於混亂和膚淺。 If the two big problems, i.e. the state-church relationship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ological systems, are not settled, we won't be able to build up theology and church systems, then mission would turn out to be confusing and shallow.



也必流於混亂和膚淺。

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有四方面不可忽視。首先是不向自由派神學妥協，繼承宗教改革的精神，強調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唯獨上帝的榮耀。改革宗神學能與家庭教會一拍即合，是因為家庭教會的信仰是保守性和基要性的，與改革宗神學有著本質上的親和性。

其次是面對無神政權的打壓和逼迫而不妥協。這是家庭教會處於“地下”和“非法”狀態的主要原因。假如家庭教會接受國家的收編，加入國家所操縱的教會體系，就會成為政府的工具，不能高舉耶穌基督的王權，走混合主義路線，這樣就不能成為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真正祝福。

第三，家庭教會注重傳福音。正是由於家庭教會的努力，中國信主的人數直線上升，從1949年一百萬左右的基督徒上升到目前至少五千萬基督徒的規模。

第四，家庭教會注重生命和敬虔，強調悔改和祈禱。改革宗神學的敬虔派也特別注重這方面。過去改革宗神學與家庭教會的張力為：一些教理派人士缺乏生命的經歷和改變，卻動輒在教義細節問題上吹毛求疵，甚至把一些家庭教會定位為異端邪說。這種以理殺人的傾向，使改革宗變成讓人生畏的“殺人宗”，非常可怕可憎！真正的改革宗應既注重純正的教義，更注重敬虔的生活，並且強調以愛主愛人之心來成全他人。

但願新一代的中國傳道人能把中國教會帶向世界，與普世教會相連。唯願上帝的旨意成就！

作者現在北美教會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 (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 (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從“性靈”到“靈性”

我的小說創作探索路徑

施璋

從詩歌到小說的 審美追求

我在蘇州、上海、南京三地長大，從小聽崑曲、越劇和評彈。戲曲留給我的是意境，由一串串細微的“妙不可言”疊映在我心裡，從而形成我注重心靈感受的審美趨向。

我首先是詩人，近年也寫小說和繪畫，而這種審美趨向主導了我所有的創作。

小說可以創造一個世界，所展示的空間是透明的，人物的五臟六腑、心思意念都被看見。剖開人性並不是殘忍的事，而是一種釋放——釋放人脫離各種自欺，還人以尊嚴。因為認識真實、面對真實，是人性的天賦“尊嚴”。只有在真實中，才可以追求自由、自律、自潔。美的基石乃是真。

中國人講“性靈”，一般指人的內心世界，泛指精神、思想、情感等。古代文獻中多有對“性靈”的描述，謂唯有人有性靈，和天地並稱“三才”。如劉勰《文心雕龍》首篇〈原道〉開卷：“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人能感應天地之華彩，領悟其中“全善之律”、“真實之美”。

傳統文學藝術大致來源於“性靈”。《晉書·樂志上》：“夫性靈之表，不知所



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古代詩歌理論“性靈說”流派的核心，強調詩歌創作要直接抒發詩人的心靈，表現真情實感。

袁枚以為“性靈”包含性情、個性、詩才，而性情是詩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之外本無詩”；“作詩不可無我”。袁枚的“性靈說”是在李贄“童心說”的啟發下產生的；李贄主張，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體現。在個性和性情的基礎上表現藝術的構思與學識，正是古典文學藝術審美的核心。

前人的觀點使我在小說創作時，有幾方面趨向。

首先，重內心精神層面的挖掘。所有的人物和環境，都是為了更有效和準確地呈現人性、人心。甚至小說的結構和情節都是為了更充分地展現人物內心的細微。如何讓人看到生活現象背後的靈魂呼喊、生命掙扎？如何讓匆忙中忽略的悸動從心底浮起，讓人走入自

己、瞭解自己、釋放自己、醫治自己？

其次，注重“真”。“功夫在詩外”的知識貯備、心靈境界的提高、語言和結構的文學技巧、意境和氣韻的運用，這一切的追求都僅僅服務於“真”，為要“準確”而又“不隔”地呈現“真”。“準確”與“不隔”之間的張力，是我創作中的掙扎，也是不斷提升方式和技巧的動力與目標。

第三，就是變。寫作成了對自己認知的過程，我也藉此去認知人類的共性。我無法滿足於在同樣的認知程度中一再書寫。同時，我心靈奔跑的速度太快，我一直想抓住它，想知道“我是誰”；寫作成了我追逐自己靈魂的過程所留下的痕跡。因我始終追不上自己的靈魂，文字的表達也就永遠有一種毫無把握的陌生感。

探索自我的性靈之境

《世家美眷》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94年冬開始寫。那時我在北京文聯書店承包發行部，做書商。當年長篇小說越來越火，詩人卻大多下了神壇。在那個特殊時期，京城詩人處於精神與金錢、夢想與現實的博弈交媾中。我動手寫小說，一是因著丈夫準備出國留學，需要一筆錢，二是我突然像上癮似地想講故事。

整整一年半，我每天在清華園裡寫。因為沒寫過小說，所以頭一段很艱難，寫了七遍

在小說創作的初始階段，我只是以探索自己為線索，……從而得以“無隔”地呈現一個時代的精神“潛流”。

When I started to write novels, I probed deeply into myself . . . to transparently express the undercurrent of our age.

才滿意，之後就一路順暢。寫的是我父母家族中的故事。人物、場景、事件，不斷像演戲般出現在我面前。全書蓄滿了我最初的生命衝動，最能表現我對傳統文學的審美趨向。

1997年出版時，書名為《柔若無骨》。我力求全無偽善地呈現女人在戰爭、革命、改革三個歷史時期中，肉體與靈性的生存困境與掙扎。2002年再版，更名《柔情無限》。2013年三版，我將它更名為《世家美眷》，並將全文修改一遍。

在這三階段的十幾年出版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第一版一出書即暢銷，但封面圖片中的人提告，說將她的肖像用在一本黃色小說上，以至書被禁。五年後同一個出版人再版，用了我自己的照片，連續三年熱銷。

2013年三版時，陳公仲老師在序中言：“這也是一項浩瀚巨大的靈性工程，承載了一個蘇州陸氏狀元府家族五代的衰敗史……寫的主要是一個女性世界，然而仍展現出了整個社會百年的歷史變遷，人民離亂疾苦的悲慘命運。……給我們留下的思考實在太多了，

有政治的，有歷史的，有人倫的，有性愛的，有心理的，更有靈性的。作者認為人的靈性高於理性。有靈性的作品，浸透了神聖者的智慧，有深刻的生命意識和人性意蘊，是靈魂拯救的文學。我看《世家美眷》就屬於這種文學。”

十年前，中國美女寫作大行其道。美國紐約廣播電台電話採訪我時問：“你的《柔若無骨》寫兩性很超前，應該算是這類美女寫作、女性文學的先行者，為什麼你現在不繼續寫？反而又寫起冷僻的宗教文學？”我的回答是：“當年女性的性意識被禁忌，我用文字來釋放。今天女性性意識已經成了文學中的販賣品，我何必再寫？而今天人的靈性被壓抑，甚至是禁忌，所以我要用文字來喚醒沉睡、釋放捆綁。我的文學宗旨始終是一致的。”

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說《紙愛人》，初稿是和《世家美眷》幾乎同時寫的，寫在一個本子裡擱著。2005年修改後發表在《紅豆》雜誌。寫的是男人出軌的故事，由丈夫和妻子分別以第一人稱輪流敘述，呈現婚姻變故中，男女內心世界劇烈而繁複的變化。

《紙愛人》裡面的女主人公是知識分子的典型。我以這個人物來解構竇娥、秦香蓮、杜十娘的冤屈。在這篇小說中，我已經表現自己受西方人文主義的熏染，強調主體性自覺意識，相信女人的“冤”、“不公”，與自己的“參與”有關係。與竇娥的呼喊、秋菊的反抗不同，我筆下的人物是具有人文意識覺醒的知識女性。這種女性在中國的長篇

文學作品中較少，但卻更具有當下性和中西方的共通性。

我喜歡冷靜的筆法，荒誕與痛苦被隱忍在客觀冷靜的敘述之下。人生的大慟是沒有眼淚的，是在荒誕中選擇的麻木。我在寫這個中篇的時候，最初的感受就是一種茫然，人物的行為與思想的差異形成荒誕，感覺不真實。所以在作品的最後，我寫道：“愛的人或者是不愛的人，都像紙片一樣在這個世界晃來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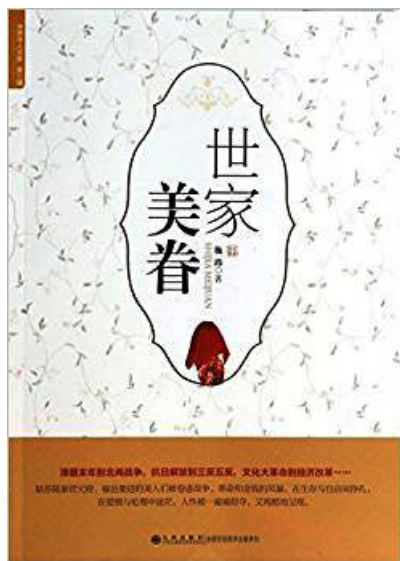
2013年《小說選刊》再次刊登這個中篇小說。二十年後，在知識分子心中隱然波動的“茫然”，已在社會中泛濫。我所描述的那種“紙片”般的人，當時還不被理解，現在卻是年輕人的主流精神狀態。我認為文學創作應當有先知的預言預見性，和寓言的奧秘啓示性。

在小說創作的初始階段，我只是以探索自己為線索，用筆如解剖刀般剖析自己的內心，自我的性靈之境，從而得以“無隔”地呈現一個時代的精神“潛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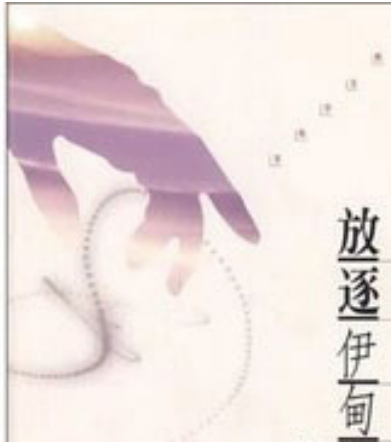
靈性文學詮釋與實踐

我是為了文學而閱讀並研究《聖經》的。1999年的復活節，我歸信了耶穌基督，同年底開始在美國西南三一學院讀聖經研究的本科。

起初只是為了更好地讀懂西方文學，瞭解西方文化精髓。隨著對聖經神學、釋經學、希伯來語等的學習，西方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終於重新向我打開大門。我發現，過去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因為宗教知識缺乏，信仰體驗模糊，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存



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應該是“社會的良心”。
Strictly speaking a writer should be the conscience of the society.



在許多誤讀。

有一段時間，我對聖經神學的著迷度超過了文學，但我所能運用的表達方式仍只有文學。從2000年到2006年，我前後六遍修改了剛到美國時寫的長篇小說《放逐伊甸》。1998年初稿寫完時，正逢《柔若無骨》被禁，書商希望馬上出我的新書，但我沒有拿出來。我的創作談《放逐之途》中記道：

“在荒漠四圍的阿爾伯克基城，在絢麗而高遠的天空下，我的生命彷彿也進入了荒原。我極端地思念留在北京的一切，思念那本已厭惡並逃避的“罪”中之樂，於是我開始寫這本小說（原名：失樂園）。

“隨著寫作的進行，我又似乎回到了那片剛剛離開的土地與人群中，重又體會著那種生命的尷尬、失落、污穢與無奈；重又體會了那靈魂與肉體被世俗之潮、金錢之潮席卷的滋味。我無限悲哀地看著我的主人公一個個走向死亡，絕望地感受著夢與“樂園”的遠離以至消失。我不能為筆下的人們及自己找到一條復歸樂園的路。

“他們與我這個創造他們的人都有著同樣的無奈與絕望。我最後給他們找到的一條路，是

在腐爛中等待著通過精神分裂進入精神樂園，這其實也是我自己多年心中暗藏的一種隱約的期待。”

在神學院學習時，上帝讓我看到人類從伊甸園被放逐的路，是一條疊映的“放逐之路”：古時的、現代的；歷史的、日常的。最後，經過七易其稿，《放逐伊甸》寫成三重複式結構的小說，描寫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精神的放逐與回歸。但可惜的是，2007年在中國出版時被刪了不少，未能完整呈現小說結構的寓意性。

我期待“知識分子”能以更多的自覺意識，承擔這個時代、整個民族的心靈負荷，表達對“靈性”、“良知”的敏感。《放逐伊甸》中，主人公們在激流中勇進或勇退，在過程中徘徊、猶豫、無所適從，正是九十年代初知識分子責任意識的真實寫照。從那以後，大家似乎因無奈而絕望，不再竭力回歸“樂園”，卻選擇主動遺忘。

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應該是“社會的良心”。但在科技掛帥的現今，大批有技術而沒“文化”的人被稱為知識分子；傳統文化中的“士”階層消失了。作家如果只會寫故事，文字技巧一流，卻不再有道德層面和良知層面的承擔，文學也就可以被各種媒體代替了。

在文學和神學上的反思，讓我在2008年正式提出“靈性文學”理念：

“‘靈性文學’這一文學概念，是基於聖經的“人論”神學，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超越。‘靈性文學’的三個層面就是：1、有靈活人的寫

作；2、呈現有靈活人的思想與生活；3、啓示出住在人裡面的靈的屬性。‘靈性文學’創作在思想、體驗、語言三個方面，特點為：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質、靈性空間的創作體驗、信望愛的文學語言。”

“靈性文學正是要給予閱讀者一雙靈性的眼睛，讓人看見繁瑣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讓人從扭曲、污損的生命中看見人裡面“神”的形象，看見人原初當有的尊嚴與榮美。它不是出“世”的文字，而是在“世”的文字；但它是不受“世”所縛的文字，是可以成為“世”之翅的文字。”

2007-2008年我主編《靈性文學叢書》五卷本，作為靈性文學的文本，收錄世界13個國家地區、百多位現代基督徒的作品，其中長篇小說卷就是《放逐伊甸》。

從此以後，我的創作就是靈性文學的實踐。長篇小說《紅牆白玉蘭》和詩全集《歌中雅歌》是最初的實踐成果。

《紅牆白玉蘭》獲得2009年世界華文著述獎文藝創作項小說類的第一名。《國際日報》主編朱易說：“施瑋的小說恣意縱橫、沒有定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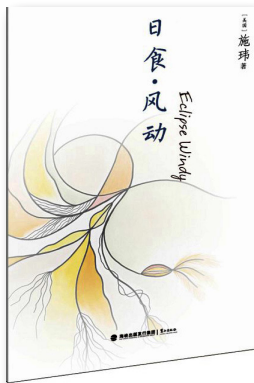


《叛教者》是我追求學者型寫作的一次實踐，蓄積了大量的知識性、歷史性貯備，和人文與神學的思考。
The Apostate was my first serious attempt to compose a scholarly novel. It involved a lot of knowledge in history, humanity, and theology.

實與超驗結合，將闊大的哲理性，奇妙地與細緻的描寫、感性的想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絢麗的閱讀效果。內斂的筆法讓讀者的痛因著被阻擋，而孕育成洶湧的內省的震撼，以及筆下人物的天窗意識，使施瑋的作品脫離了低俗的煽情、超越了對生活簡單的翻版複製。”

寫這部小說的原因，是我回北京時，看到大批中年婚姻問題的小說，而我對當時的“愛情不排隊”、“離婚是最好的出路”等價值取向並不認同。我當時正在學心理諮詢，臨床輔導時，我的心常被震痛，而我對世俗的“情障”、婚姻、愛、命運也尚未釐清。於是，我就用輔導的方法開始寫小說。寫作過程如同一場心理疏導，帶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紅牆白玉蘭》出版後，在讀者見面會中有許多反饋，以至後來我被視作婚戀輔導，還在電台開專欄。

這一時期我寫了幾個中短篇，風格結構幾乎都不同，被各種選本收入。其中最為成熟的是中篇小說《斜陽下的河流》。《日食》在2008年10月第十五屆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受到喻大翔等學者評論家的關注與好評。



文學交融中的靈性書寫

我1989年進復旦大學中文系作家班時，陳思和老師的

一句話進入我心裡。他說：希望在我們這一代出現學者型的作家。當時的作家大部分是工農兵出生，主要是靠天賦，直接呈現草根生活。直到現在，主流仍傾向這種文學，認為接地氣。但這類寫作缺乏深層哲理的抽象思考和自覺意識的反思，更沒有靈性的探索。

從1999到2013年，我陸續在美國神學院拿了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在三年半的博士學習期間，我的論文課題為“舊約文學的漢語處境化研究”，從文體來比較希伯來古文學與中國古文學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以及結構和修辭的差別對於思想傳遞的功用。期間我陸續發表了《約伯記與中國人的認識論》、《所羅門與莊子不同的“虛空”》、《實與空——比較創世記、紅樓夢的預言性敘事藝術》、《箴言與論語的處世之道》等學術作品。最終出版了博士論文《在大觀園遇見夏娃——聖經舊約的漢語處境化研讀》。

在論文末了，我說：“藉助對《聖經》文體和藝術特質的研究，可以為漢語基督教文學創作提供新的敘事視角和表達方式，讓《聖經》真正成為基督教文學的創作範本，不僅在神學思想上，也在文學形式上，成為漢語基督教文學的基石，並最終對中國的當代文學產生影響。……筆者認為只有紮根於《聖經》本身，並在漢語語境的土壤中，才可能生發出漢語基督教文學。”

至此，我覺得自己才構建好靈性文學創作的的基本理論體系，可以跨入新階段的小說創作。

2014年3月發表的中篇小

說《記憶條》，是我讀完博士後的第一次創作實踐。這是構思的一個《溫暖國》系列中的第一篇，我循聖經中的神學和寓意，構建了一個具有當下中國人情懷的虛擬世界——溫暖國。同時，我將心理醫治程序和穿越文學、成人童話，一起整合在神學邏輯底座上，對文革創傷和移民生活進行了新的敘事。

以下是一位讀者所寫書評的片斷：“《記憶條》以溫暖國的‘小火苗’為敘述視角，由於‘小火苗’可以自由地進入人的靈體，知道人的心裡活動，所以小說中人物的內心猶如透明一般呈現出來。如果我們熟悉聖經，我們便會知道聖經中‘火’的意象常與聖靈有關。那麼《記憶條》中就不止一次地透過‘小火苗’寫到聖靈的嘆息，聖靈的擔憂，由此寫出靈魂深處的破碎與絕望。”

這是第一次實踐。由於中國讀者和評論家對聖經文體和典故並不熟悉，而我的掌握也不夠純熟，因此大家關注的主要是創傷醫治的內容，而忽略了我借鑒聖經敘述模式，應用啓示文學和先知視角寫作的嘗試。

學者型寫作的實踐

2015年1月，我著手寫《叛教者》。這是一部我從2000年就開始醞釀、閱讀，2003年開始採訪、收集資料，以真實歷史事件和人物為原型的長篇小說。

完稿後，我曾和一位博士生導師一起開了一門原型人物的生平與神學思想研究的博士課，並將小說稿送給神學、史學專家預讀，以確保史料和神

雖然寫作者的本質是孤獨的，但仍是希望與同道中人共勉，不以文學為技，而讓它……成為光的通道。
Writing is a lonely job. However, I wish to encourage other writers not to use literature as a skill, but to make it . . . a tunnel of light.

叛教者

RENEGADES

施瑋◎著
SHI WEI



學思想的嚴謹。我確實是以治學的精神來分析研讀材料，並進行文學創作。“性靈說”對人之“真”的追求，和“靈性文學”對神之“真”的追求，在這次創作中相遇。

這本小說我從外寫到內，筆法也由繁入簡，彷彿一層層剝洋蔥，並且越剝越快，以深度和力度在思想情感高潮中圓滿收筆，克服了長篇小說虎頭蛇尾的通病。

《叛教者》是我追求學者型寫作的一次實踐，蓄積了大量的知識性、歷史性貯備，和人文與神學的思考。也因此，它的讀者不限於文學愛好者。許多從來不讀小說的人文學者、歷史學教授、哲學和法學學者、牧師等，也都熱烈地閱讀並討論。這本書在以年輕一代流行文學為主的電子書平台推出後，半年內銷售日日榜首。

由此印證了我對今天文學走向的思考。我在“跨越時空的舞蹈——新移民文學發展的可能性路徑”一文中曾這樣寫：

“首先是以新移民視角看中國歷史、中國現實、中國人的

故事，作家可以在其作品中對這一切進行重新解讀。在具體的創作中，新移民文學創作者可以利用海外資訊更多、圖書館收藏更豐、生活在海外的歷史知情人更願說出真相，等等。來重新探索和還原一些事件的真實，由此挖掘人性的真實，反思歷史和民族性。……新移民作家通過學習和理解西方的人文、哲學、宗教，……通過融會貫通中西方的宗教與哲學，從而發展出新的文學形式，找到新的故事單元結構，塑造新的人物。”

《叛教者》受到中國很多學者的關注，近二十位學者為此書寫下評論，其中王文勝、冉雲飛、朱雲霞、張娟等都寫下近萬言的評論。方忠教授說：“掩卷之餘，深長思索，一部小說在給讀者提供豐富的人生體驗的同時，如果因其在人性上的大膽深入開掘，而能給人以更多的啓迪和遐想，這樣的作品應該更有思想的力量。施瑋的《叛教者》就屬於這樣一類作品。”這不啻是對我的一份期待和激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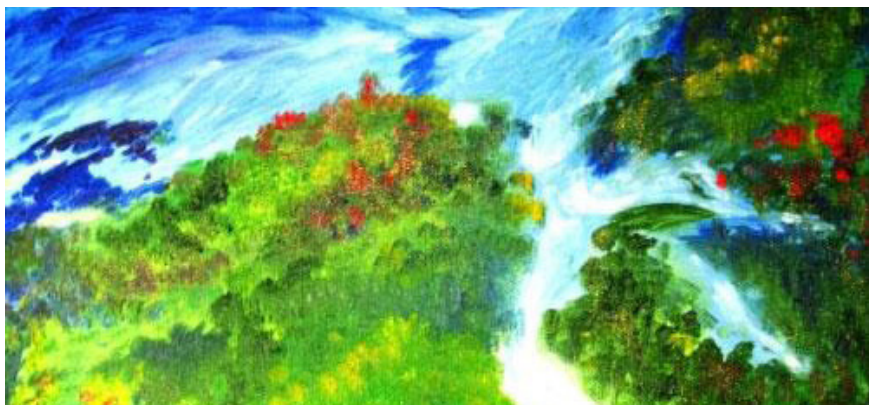
更讓我欣慰的是，評論家們的關注點，從淺層的“愛”與“救贖”到達神本的人性解讀，並且也關注到了我在文體結構上的嘗試，就是中西方文學、聖俗文學、經典與當下，

結合交融的嘗試。王文勝教授說：“施瑋在《叛教者》中熟練地運用了《聖經》中的英雄敘事範式來展開對英雄主人公李述先的書寫，作者對《聖經》敘事模式中‘典範場景’（type-scene）的運用不僅增強了《叛教者》的敘事張力，而且也豐富了中國基督教題材小說創作的敘事手法。”

二十多年的小說創作過程，也是我從“性靈”到“靈性”的探索過程。白駒過隙，不覺已經年過半百，難免忐忑是否還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將預備與貯蓄的變成作品呢？但即便最終我寫不盡心中之意，又有何憾？文學創作於我，已經不是目的導向，而是過程導向。一路過來，好像武俠書裡獨行的劍客，一直在尋求自我的突破，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也是一次次的自我釋放，一次次上天的呼召也是一次次命定的成全。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雖然寫作者的本質是孤獨的，但仍是希望與同道中人共勉，不以文學為技，而讓它成為一條通道，成為光的通道，也供靈性的追求者上下求索。✚

作者為詩人、小說家、畫家



回國這六年

李晶

白 2012年神學院畢業、全家回國服侍，六年彈指一揮間。2018年4月，教會給我三個月安息假，我們一家得以返回加州休息。期間承蒙陳牧師、師母鼓勵我寫一點侍奉的感想。雖然自己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牧者，卻也願分享自己的五餅二魚，求主掰開、使用。

踏入牧職

剛回國時，重新適應國內環境帶來諸多挑戰，孩子也才滿月。為緩解各方面壓力，我選擇在主內教育與文字機構上班，同時在北京一間家庭教會做半職教牧同工。兩年後，心裡對教會的感情和負擔越來越重。妻子和我久知牧會艱難，然而順服主的感動更重要，於是我們邁出信心的一步，從2015年開始全職牧會。

這間教會有主任牧師、兩位傳道人（包括我）、一位行政同工，這種“配置”在國內已是非常蒙恩。我原本打算在資深牧者的遮蓋和指導下學習，然而因著各種考慮與時局變化，教會在當年夏天突然決定植堂，指派初出茅廬的我，帶領一批弟兄姊妹，在北京東部開拓。

經過近一年的緊張籌備，2016年5月，東堂正式成立。會眾約有三十人，大多是職場年輕人士。同工們則像我一樣，絕大部分都是新手。一間年輕的教會，靠著主的保守就此啟航。

2018年5月，東堂即將迎來兩週年。目前會眾約有五十



人，在財務、治理、牧養等方面基本實現了自立。細細數算，全是主的恩典！

三點心得

回首這幾年的服侍，心中感慨萬千。在兼顧安全與坦誠的原則下，簡單分享三點感想，歡迎讀者和前輩們拍磚、指教。

第一，講道與門徒訓練是教會成長的基石。我們教會成立之初，就特別注重研讀與傳講神的話。教會形成按經卷釋經講道的傳統，小組查經材料也由同工們依據“觀察—解釋—應用”的歸納法邏輯編寫。起初，這種風格讓我感到壓力甚大，每次講道預備不少於四十小時，一遍遍地打磨，也常被主任牧師“無情批判”。然而幾年過去，我看見紮實講道對整個教會的啓迪與建造，我自己也受益良多，為此感恩不已！

然而，光靠講道來建造教會，弟兄姊妹可能會成為頭腦知識多、信仰實踐和屬靈身量卻跟不上的“大頭娃娃”。為避免這種傾向，我在東堂推廣

門訓異象：“人人作主門徒、人人愛主侍奉”，並帶領門徒訓練班，鼓勵弟兄姊妹遵行神的話，領人歸主。門訓雖有許多稚嫩、不完善之處，但兩年過去，給弟兄姊妹帶來的新氣象顯而易見，整個教會也變得更有屬靈活力。

除了講道與門訓，教會還有一個關鍵領域：禱告。然而我不得不承認，在高度世俗化、節奏快、壓力大的北京，禱告是我們的一個軟肋。如何復興教會的禱告會，我仍在摸索和仰望中，求主憐憫。

第二，生命不斷成聖，是教會急需突破的瓶頸。全職服侍之初，我曾向一位老牧師請教：“牧會最大的挑戰與困難是什麼？”那位長輩回答：“同工關係。”過去幾年的植堂與牧會，令我深感此言不虛。

深入服侍時，教會經受的最大痛苦與消耗，正是來自於同工關係。關係的緊張有多重原因。比方說，每個人（包括我）多少都帶著血氣和自我，習慣於優先考慮自己的需要、喜好、小圈子，以致於不能以慈愛和公平待人，或以神家神國大局為重；每個人也帶著過往的包袱，不能放下自己，對人對事帶有成見；與此同時，國內特殊的社會環境與華人文化，令人們對權柄和金錢等因素格外敏感，影響到彼此的信任，有礙教會體質的改良。當然，還有從不缺席的魔鬼撒旦，總是趁機在同工關係上煽風點火、挑撥離間！

如何對待牧者，是教會和牧者都需要學習的功課。
How to treat the pastor is a lesson both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 must learn.

教會同工基本都是重生得救、愛主的基督徒，這一點我非常確定，也為此感恩。然而以上種種情形讓我體察到蒙恩罪人的罪性、有限，以及教會聖工何等需要靠賴神的寬恕與恩典。關係上的緊張和疙瘩，暴露出生命裡的破口和需要更新之處；由此顯見我們得救之後必須追求成聖。關係的突破，需要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不斷更新變化。

同工在神家中有權柄、有影響力，同時也有更重的責任。在這忙碌喧囂的末世，我們實在需要更注重與主的內在關係，不斷謙卑、不斷悔改，不斷對付自己，在成聖上下功夫，“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以與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後書1:4）。許多人講起理來頭頭是道，但要在團隊中合作，卻格外困難。唯有模塑出“信心、德行、忍耐、愛心”（彼得後書1:5-7）等像基督的性情，才能跨越性格、背景、恩賜等的差異，避免隔閡的陷阱，同心美好的侍奉。

去年我曾有機會跟數位牧長交通，大家不約而同看到：基督的教會固然外有逼迫、內有財務等多方面壓力，但最大的危機仍是靈性危機。信徒和同工如何在成聖上不斷長進，

教會的靈修與靈性當如何提升，急需突破和禱告。求主施恩幫助祂的子民。

第三，如何對待牧者，是教會和牧者都需要學習的功課。中國家庭教會傳統上以牧者為主導和核心，會眾跟隨牧者前行。然而，這種家長制模式對牧者缺乏監督，以至個別教會曾因著牧者跌倒，而大受損傷。一些信徒引以為戒，對牧者的態度由愛戴轉為戒備、疏遠。而這一代人懷疑主義、抵制權威和建制等思想高漲，信徒對牧者的心態也受影響，甚至發展到制衡和對抗的地步。

對於教會治理，我個人也不認同一言堂式的家長制。由靈性品格均成熟、對神家有負擔、肯受苦的同工們集體決策，應是上策。對牧者戒備、制衡、缺乏信任的心態，是一種矯枉過正的過激反應。倘若教會處於這種心態，在屬靈上恐怕很難進入豐盛，走得長遠。

總之，牧者的確需要教會監督，但教會也要信任、順服自己的牧者。求主幫助我們合乎中道。

正確看待自己

牧者也要正確看待自己，在這一點上我學了很大的功課。

自從戰戰兢兢領受植堂任務後，我就頂著很大的壓力。首先，我知道植堂的成功率從來不是百分百，實際上有許多植堂未能成功的例子。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牧者，我很怕這新建的教會在我手裡夭折。於是，我拚命禱告，並且幾乎傾注了全部的心血。

在神學院受訓期間，我深切體察到：教會創始人和早期傳統對一間教會的後續發展有深遠影響。既然自己成了東堂首任牧者，我便真誠地希望自己打好根基，給教會儘可能留下好的傳統。於是，我身先士卒、全然投入。在同工團隊尚未成型時，台前幕後、大小服侍我幾乎全做過，用為父為母的心，努力呵護這個小生命，盼其健康長大。

因著某些長遠考慮，我對教會的牧養、治理也進行一些必要的改良。雖然沒有任何人要求，但因著對教會的愛和負擔，我心甘情願地投入著。然而在此過程中，有人對我產生了誤會與論斷。當我無意聽到某些流言蜚語時，委屈的淚水幾乎當場灑落。有人常保持疏離、甚至戒備，令我感到孤獨。當有人帶著情緒質問我、甚至當眾指責時，說實話，我的心在滴血。

回想這些年牧會與植堂，我奉獻出精力、金錢、家庭時間、甚至身體健康。為著教會的緣故，我數次向有關部門抵押自己的身份證，也多次被警察約談喝茶。漸漸地，我有些灰心軟弱了，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稱職……。

然而，神有慈愛、有恩典。祂顧念我這六年的連續作戰與需要，讓我們一家回到加



2018北美神學生會議回顧

李鋼



北美中國神學生第五屆會議於2018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在加州洛杉磯創欣神學院召開，主題是“宣教”（Mission），超過三十位來自十幾個神學院的學生參加，加上配偶和孩子，共有五十多人。

開幕之夜，創欣神學院的陳俊偉院長以“呼召、事奉與人生”為題，勉勵神學生們明確呼召、持定信仰、學習作領袖。另一位講員劉官弟兄，是會議總幹事。他回顧過去四屆大會的概況，並列出歸國事奉的挑戰，包括與母會的關係、服事方向、子女教育、經費來源等實際問題，讓神學生提前預備將來可能遇到的難處。

接下來三天半，十幾位講

員豐富地呈現了“宣教”對神學生當下的學習與將來的禾場可能的應用。

品格與靈命

第一天和第三天早堂的講員是陳宗清牧師，他以“學習做僕人”和“宣教人的心志”為題，分享神的話語。



路加福音17：7-10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

是我們應分作的”。唯有懂得謙卑、活出僕人式樣，才能在宣教工場、服事崗位上榮耀神。

陳牧師從羅馬書15：20-29引出“宣教人的心志”。他講到七個心志：受苦、律己、冒死、處境化等。最後特別提到“團隊事奉”。神的國不需要個人英雄主義，而要彼此配搭服事。

海外校園的創辦人蘇文峰牧師，第二天早堂以“妙手重撫”為題，解開馬可福音8：22-25。主耶穌醫治瞎子，兩次按手在他身上，以致瞎子不單能“看見”，更能“看清”。我們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也需要不斷調適眼睛，常常仰望耶穌。

（接上頁）

州過安息假，在身心靈各方面休整。剛回到洛杉磯，許多弟兄姊妹和長輩就用愛心招待我們，慷慨借出自己的房子、車子等，叫我們沒有任何缺乏。

一個月過去，我們的體力、精力、家庭關係恢復不少。最近我讀到邊雲波老伯伯的《殘年憶史》、以及《舉目》雜誌的教會專欄，確知傳道人走的就是十架窄路和死

路，心裡得到安慰與堅固。跟幾位久未謀面的肢體交通時，意外地看到聖靈透過我在牧養他們，這讓我恢復了一點信心，重新找到牧者的感覺。

關於牧者如何看待自己，我最近越來越有一個啓示：牧者固然要有背十字架的捨命心志，但也要學習交託與安息，因為蒙愛的自我形象也是健康牧會必不可少的。

作為一個年輕牧者，我有許多問題與不足。今天的我，仍在安靜與反思當中，願聖靈賜下啓發和光照。但那位我已信靠、並跟隨整整十六年的主，祂“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篇23：1）。阿們！

作者現在北京牧會

許多實際的難處讓我們看到神學生歸國後的挑戰；也讓我們提前預備、思考將來的服事道路。
There will be many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seminarians when they return to China to serve. The lectures helped us to prepare beforehand for our future ministry.

創欣神學院的戴永富老師，最後一天早堂分享“神學院靈命操練對神學生知行合一與宣教委身的重要作用”。他講得幽默生動，提出現實中的幾大“分裂”——腦／心分裂、個人／集體分裂、傳統／創意分裂，導致靈性成長受到抑制，生命與服事產生張力。他指出靈命操練的條件，要以“心”為中心。

宣教真理與實踐

大會邀請了幾位學者分享中國處境下的宣教。魏布萊特牧師（Gregory L. Waybright）的教會75%的資金用於宣教。他講解啟示錄2：12-17，以“別迦摩的視角”為題。這世界是在撒但的權勢之下；然而，在黑暗之中仍有十字架的光芒。神應許將不可奪走的永恆福分賞賜給堅忍的信徒。這信息讓我們認清在逼迫中的中國教會何等需要神的話語。

奧特博士（Dr. Craig Ott）分享“培養與差派中國宣教士的需求與挑戰”。他數十年在德國教學和宣教植堂。他強調上帝是宣教的上帝，勾勒出中國宣教的實際需要，並將之放在世界宣教格局中進行對比，促使我們去思考：如何從世界的視野處理跨文化宣教。他承認中國教會面對各種挑戰，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加強宣

教士的培訓、語言與神學的學習、教會與差會的合作、吸收歷史經驗、加強處境化的應對等，幫助宣教士與宣教地建立橋梁。

孫毅博士以“中國教會與普世宣教的一點思考”為題，一開始就提出挑戰：現在是否是中國家庭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時機？贊同者提出：中國教會向普世宣教，是由跨教會的宣教機構起來承擔，並要與海外華人教會合作。不贊同者則認為：宣教路線應循三個步驟漸進：建堂（合法化）、植堂（本土化）、宣教（跨文化）。中國教會在自己的文化中還沒有彰顯福音的力量，如何談得上宣教？孫博士提醒：中國教會向其他地區宣教，並不具有文化上的優勢。這個“文化落差水位”的問題值得思考。

教會成長與宣教實踐

三位國內家庭教會的領袖，帶來許多實戰的經驗。

趙牧師在中國南方服事，不僅有牧會經驗，更帶領團隊植堂發展。他分享“團隊型教會與宣教”，強調需要加強神學教育、健全牧養與門訓體系；並根據中國處境，建議要建立成熟的差會，各宗派間要合作與配搭。

在北京事奉的李牧師講“從大使命看合神心意的教會”

，從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原文解經，來分析教會的性質、教會的權能、責任和功用。教會的宣教使命在於：使萬民在個體成為門徒的過程中，達成合神心意的教會。

玄牧師本人是宣教士，他分享“建立宣教導向的教會”從宣教的教會、禾場，以及兩者間的互動三個層面來闡述。玄牧師的宣教策略是：1) 門徒培養，2) 植堂宣教，3) 集中宣教，4) 聯合宣教（教會、差會、神學院）。

幾位教會領袖都強調教會在宣教中的核心作用。雖然這條路艱難，但大家都認同一點：神是宣教的神，教會需要順服在大使命之下。

喜悅與辛酸

一線宣教士陳維恩牧師作了兩堂專題分享。第一堂講“以教會主導的普世宣教”，他傾訴自己如何離開牧職，率師母及兩個女兒一同去比恩族傳福音，建立教會。他見證了神使用教會、宣教士，來達成不可能的事工。

他第二講的題目為“四個不可妥協的宣教核心價值”，指出跨文化宣教的核心價值為：1) 語言學習的必要性，2) 福音傳遞的完整性，3) 建立教會的必須性，及4) 相信苦難是完成大使命的代價。這些總



結來自過去十年陳牧師一家的宣教經歷，以及前輩宣教士的開拓經驗。

陳維恩牧師的生命分享打動了每一位，他的師母在歷癌患難中，仍然見證神是宣教的神，更令人動容。

劉官弟兄在大會最後一晚分享了過去一年的經歷，許多實際的難處讓我們看到神學生歸國後的挑戰；也讓我們提前預備、思考將來的服事道路。北京的“神歸團契”為回國服事的畢業生提供了交流、學習、連接與代禱的平台。

最後，參會的神學生彼此禱告祝福。我們的心因著福音宣教、因著肢體間美好的見證、因著主的愛與真理，更深地相接。

觀察與思考

這次大會還安排了“宣教中國”的專題討論會，由幾位家庭教會領袖和宣教士同台回答問題。此外，大會組織了一次公園野餐，讓大家在自由、輕鬆、休閒的狀態下彼此認識。

面對2019年大會的預備，筆者提出一些建議：

1· 提前預備大會主題：根據北美神學生學習和歸國的現實需求，列出幾個系列主題。

2· 加強神學生的聯絡與邀請：讓更多北美的神學生知道這個會議，並願意來參加。

3· 神學生、院校、機構的交流互動：資源的整合與支持有待加強。

盼望每年一次的北美中國神學生會議能辦得更好，願主恩傾注，讓神得榮耀！



作者就讀於美南浸信會神學院

淡淡鄉愁 · 悠悠琴韻

舍禾



回憶是淡淡的愁

好不容易等到了「長大」，卻被一種叫「回憶」的東西緊抓不放，它盤踞在心中，常常讓我重重跌回如夢一般流逝的時空。

有時候，我會去尋找那種寧靜安詳，又略帶愁色的旋律，享受那種哀哀怨怨、咿咿呀呀的空靈感。當淡淡的愁緒由心頭升騰，順著思念的痕跡，我會去找尋童年的虛幻，少年的難堪。都說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它如影隨形，無聲無息地出沒在淒美的音符中，令人肝腸寸斷。

有時候回憶也有色彩。望著窗外被風輕搖的樹枝和歡然起舞的葉子，眼前頓時出現一幅鄉境：兒時家門前的柚子樹，主日學教室後面那片蔥綠的竹林，賞心悅目，叫人思緒萬千。但是，時間的利劍總會無情地在這幅畫面上刻劃、刮削，漸漸地，心靈中那一抹色彩層層脫落，只留下一片蒼白。

我喜歡回憶，常常回味那段無法彌補的殘缺。我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接受過基督信仰，但卻遠離了神。病魔從來沒有離我遠去。我喝過由廢紙燒成的灰湯，曾早晚虔誠跪拜菩薩，上學的路上路過廟宇，還不由自主地進去拜。

我曾是留守兒童。父母為生活遠走內蒙，在瀰漫著毒氣般的裝修工地上討生活。我和弟弟寄養在鄰村阿姨家中。那段日子常常經歷飢餓的滋味。夜幕低垂，老宅的廣播響起，聽著家鄉話播放的新聞，糾結的心腸卻在想：阿姨姨丈什麼時候才從田間回來？我真的好餓好餓！春節什麼時候才來？我好想好想爸爸媽媽！

有一年，我和弟弟回家和爺爺奶奶同住。春節近了，村莊開始沸騰，在外謀生的人們一車一車地回到家鄉。親人相見的那一刻，有人喜極而泣，哭聲裊裊；有人感嘆命運，大聲嚎啕。

看著隔壁一家家「鬧」團圓，我打開爸爸的來信，信中並沒有說明確切的日子，只告訴我，農曆12月20之後才能到家。於是，我每天拉著弟弟的手，趟過村頭的溪水，到鎮上的汽車站等。我們引頸期盼，不放過每一輛車，多麼希望下一位走下來的就是爸爸媽媽。望斷秋水的日子真的不好過。突然，一場大雨引發山石崩塌，阻斷了我們通往希望的路。我帶著弟弟，每天去坍方的地方，用稚嫩的眼睛搜索著父母的身影。農曆12月30日，終於等到了爸媽。我無法形容那一刻的感受，心情如同翻江

我無法擺脫從回憶而來的淡淡的愁，它是那麼悠遠，那麼親暱，那麼變幻，又那麼真實。
I could not dismiss the faint nostalgia. It seemed so far yet so near, so dreamlike yet so real.

倒海，痛苦快樂摻和著。穿上新衣，拿上寥寥的壓歲錢，總算進入了舉國歡慶的春節之中。一切的苦澀、委屈、孤獨，都煙消雲散，拋諸腦後。

過了正月十五，爸媽又要啓程遠走高飛了。他們離開前的晚上，我抱著媽媽的大腿，在哭泣中進入夢鄉。可惜，我單薄的雙臂根本沒有力量挽留他們。在夢裡，我哭著哭著，突然聲嘶力竭的喊「我不讓你走」，這一喊，把自己從夢中拽了出來，那時才知道，我緊緊抱住的是奶奶的大腿，媽媽已經走了。我後悔從夢中驚醒，畢竟夢中的痛不是真痛。

13歲那年，我和弟弟成為教會第一批兒童主日學的學生。我的童年從此只珍藏這單一的記憶。

每個週末，幾十個孩子在一起禱告，年紀輕輕卻是憂國憂民，想起中國需要福音就熱淚縱橫，哭聲一片。每一堂課，我們饑渴地背誦聖經金句。節假日就開培靈會。暑假必定組織隊伍，在偏僻鄉間傳遍救恩的信息。就這樣，我們慢慢長大了。後來，我們也慢慢分開了。帶著對彼此的掛念，走進了青年、成年。

2006年，我成了遊子。在美國的日子，我的大腦突然變成了回憶的機器。有時會因回憶而咯咯傻笑，有時會因思念而潸然淚下。我無法擺脫從回憶而來的淡淡的愁，它是那麼悠遠，那麼親暱，那麼變幻，又那麼真實。

古老風琴—靈魂音韻

刻滿歲月滄桑的風琴，是我們鄉村教堂唯一的樂器。它渾身上下布滿劃痕，幾處白鍵



表皮脫落，一個低音鍵已然失聲，連接踏板的兩條帶子斷了又斷，縫了又縫，致使踏板不斷抬高，必須費很大力氣才能把風送到音管。琴聲似乎總帶著潮氣，如同感冒。不過，這架風琴卻讓我少年時能詩意地活著。

一切都從十歲重生得救的那年開始。教堂裡激情澎湃的歌聲，就如昨夜的美夢，讓我心靈奮起。悠揚的琴聲讓我如痴如醉，感受到幸福如此嬌艷。

每當人群散去，我便坐在風琴前，一心想與人琴融合，讓靈魂陶醉。堂家二姐是我的啓蒙老師。功夫不負有心人，沒多久，我便能掌握十二個調，成為那時最棒的司琴。

我的童年沒有娛樂。放下書包，最常去的就是教堂。週間下午，教堂大多空寂，推開虛掩的大門，便能看見那架彷彿老得瑟瑟發抖的風琴。在教堂裡編織禱告墊的住堂奶奶，常親切地說：「孩子，你來啦。」其實奶奶的眼睛不好，她是憑著推門的力道和腳步聲辨識出我。「先跪下禱告」，奶奶常常這樣吩咐我。在虔誠的禱告之後，我的手腳便交給了風琴。

慢慢地，風琴成了我傾訴的管道。那些年盛行小敏的《迦南詩選》，我彈奏著詩歌，向神表達熱愛、渴慕，又因童年的痛楚，從靈魂深處發出呼

求。往往彈著彈著，就泣不成聲。住堂奶奶遠遠注視著我，看不清卻聽得明，把對我的心疼埋在她的淚痕之下。

有一對姐妹也是這架風琴的超級粉絲。妹妹和我年紀相仿。主日上午聚會結束後，姊姊就佔著風琴，妹妹則回家享受午餐。等妹妹回到教會，姊姊才回家用餐。直到下午聚會開始，她們才放過這架已然疲憊不堪的風琴。很多個主日中午，我蜷縮在教堂的長椅上，忍飢挨餓，眼巴巴地望著風琴，求神讓對方去一趟廁所，好為我騰出兩分鐘的時間；然而這禱告大多得不到應允。

自從戀上這架風琴，我便發現自己有無數精神抖擻的音樂細胞和強烈的音感。任何一首新歌，只要聽過一次，便能在風琴上輕鬆自如地彈奏。教會每年兩次青年培靈會，少則兩百人，多則四五百。在那靈火焚燒的時代，培靈會歌聲洶湧，領會的人不用翻詩歌本，奮興詩歌一首接一首，會眾放聲高唱，從不忘詞，從不遲延。在這樣的音樂海洋中，作為司琴，我的每個手指頭靈活飛舞，洋溢著聖靈的恩膏，由於情緒激昂，幾乎將風琴的踏板踩斷。

幾年後，從風琴到電子琴再到鋼琴，我竟然都能彈奏自如。我又愛上了笛子、蕭、口琴、吉他、二胡、軍鼓，並吹過短號、嘗試拉小提琴。

如今，鄉村教堂的古老風琴已經消失在歷史塵霾中，但在我靈魂的深處，它依然琴聲悠揚。



作者在美深造12年，取得教牧博士後，於2018年7月帶全家回國服事。請讀者代禱。

聖經中70年的特殊含意

對熟悉聖經的人而言，7和70具有特別的意義。

聖經中的數字都有屬靈的含意。其中，7是代表「完全」的數字。神的大作為常與7相關，世界的創造是7天完成，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我們從自然界也可以觀察到7的規律性，如：音樂有7個音階、礦物晶體有7個基本系統、物理的週期表有7個層次。有意思的是，人的臉骨、頸骨、腳踝都由7塊骨骼組成；頭蓋骨上的洞也是7個。

7對猶太人是神聖的。例如：第7日是安息日；大祭司贖罪日要在施恩座上灑血7次；聖所的燭台共有7根支子。7個安息年之後是禧年，被壓制的人都可重獲自由。啓示錄中更充滿7的數目，與神的審判有關：7印、7號、7碗。

70年常代表神在時間中掌權。摩西在詩篇中寫道：人一生的年日是70歲——這是神定規給人壽命的常態。耶利米先知在猶太國第一次被擄時，預言70年後百姓會從巴比倫回歸（耶利米書29:10）。後來波斯王古列下令重建聖殿，應驗了這預言。

但以理先知得到啓示，神為聖城耶路撒冷定了70個7，就是490年；這日期與彌賽亞的出現有關（但以理書9:24-27）。許多解經家提出計算的方法，認為希律年間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以及第二聖殿被毀，準確應驗了這段預言。

以色列建國70年與末世預言

對於末世的時間，聖經明說是個奧秘：「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馬太福音24:36）

然而，耶穌曾說：「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馬太福音

24:32-34）這段話告訴門徒如何分辨祂再來的徵兆。

由於無花果樹常預表以色列，所以，對這段話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即：主耶穌再來的時間與以色列重新建國有關。因此，當二次大戰結束後，顛沛流離的猶太人突然有了自己的國家，持這種解釋的人便興奮異常。對於「這世代」當如何解釋，他們更是非常有興趣。有些人把「這世代」與摩西的詩相連，指一個世代是指人生70年。難怪當以色列國屆滿70年時，「末世將臨」的說法與期待，在一些基督徒群體中廣為流傳。


神在人間掌權

聖經宣示神是人類歷史的主。但以理書主要的信息便是：世上國度的興衰、君王的更迭，背後都有神的主權。箴言21:1說：「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壟溝的水，隨意流轉。」

過去兩個月所發生與70年有關的事，最核心的相關人物無疑是川普。2016年他打破世人眼鏡選上美國總統，就位後從不按政治成規行事。今年他讓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正式遷往耶路撒冷，此舉對以色列是很大的鼓舞。

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1996至1999首度任此職，當時只有46歲。他出生於以色列，在美國受教育。他還年輕時，就曾有牧師預言他會出任總理。2009年迄今，他每次選舉都以最低高票留任。他的危機意識很高，認為以色列若稍一妥協，便可能滅亡。

朝鮮的領導人金正恩是個特立獨行的異人，年僅三十餘，卻敢率領小小的朝鮮與全世界對抗。

總而言之，2018年所上演與70年有關政治大戲，領頭人物個個相當特別。若換了別人，這些事可能都不會實現。對於相信神掌權的人而言，我們知道世界舞台背後真正的主導者是神。這些「君王」的演出內容，都在祂的掌管之中。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七十年

蘇卿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
(但以理書4:17, 9:24)



".....so that the living may know that the Most High is sovereign over the kingdoms of men!
"Seventy 'sevens' are decreed for your people and your holy city to finish transgression.
(DANIEL 4:17,9:24)

2018年5、6月發生了兩件大事，起頭都是1948年，如今滿了70年。

5月14日，以色列舉國歡慶建國70年。這個地中海邊的小國，在仇敵環伺下插針，幾經嚴酷的戰爭考驗，至今雖然不斷受到從地圖上被抹去的恐嚇，卻勵精圖治，以致在全世界的科技與金融上居領銜地位。在國慶表演大會上，一萬二千人合唱「所有這一切」，歌詞中祈禱：「親愛主，求你賜下祝福……求你不要拔除所栽的。」

6月12日，舉世矚目的川金會在新加坡舉行。這場會面曾一波三折，好似雲霄飛車般突上突下，但兩位元首終於同時出現在聖陶沙。當兩人伸手一握，朝鮮半島70年的敵對、核子戰爭的緊繃威脅，瞬間化為歷史。

其實在近代歷史上，還有一個70年突然逆轉的重大事件，就是1991年的蘇聯解體。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到了第70年，一夕之間四分五裂。

(轉封底裡)